

“洋人路”一去不复返

国庆连接中秋，汉口山海关路又火了一把，外地游客蜂拥而至，品尝汉味小吃，体验老街风情。只是鲜有人知道，这一片曾被日本占为租界，山海关路原名山崎街，得之于日本领事山崎桂；卢沟桥路原名大正路，更源于日本大正天皇的年号。

日租界之外，以外国人冠名的大街小路比比皆是，老武汉人称之为“洋人路”。俄租界，有尼古拉大道、鄂哈街、玛琳街、亚历山德罗夫大街、列尔宾街、阿列克谢耶夫街；法租界，有吕钦使街、玛领事街、德托美领事街、威尔逊总统路、霞飞将军街、福熙大将军路；德租界，有海因里希亲王大街、威廉大街、腓特烈大街、奥古斯塔大街、维多利亚大街、路易莎大街、索菲亚大街、夏洛特大街、多萝西路、施妥博路、海靖路（德国公使的中文名）。从中不难看到，皇帝、皇后，国王、总统，亲王、贵族，将军、领事无所不有，在中国的国土飞扬跋扈。

也许令人奇怪，为何英租界没有“洋人路”？这是由于它第一个开设时，中国政府限定只能使用中国地名，因此有了湖北街和湖南街、洞庭街和鄱阳街，但太平街、怡和街、阜昌街、华昌街上还是借了洋行商号冠名，暗含殖民色彩。

事实上，英租界不会那么老实，公然将触角伸到租界之外。今天的惠济路、惠济一路、惠济二路、解放公园路，原名杜韦利路、赫德路、奥士敦路、渣甸路，其人一色英商大亨。这一带尽管远在郊野，却早已被洋人圈为西商跑马场，其中最大股东怡和洋行劫夺了路名权，因而洋行创始人威廉·渣甸落地为名。渣甸靠倒卖鸦片起家，路名也不好听，1954年跑马场变身解放公园，一条解放公园路便取而代之。

美国在汉口没有租界，倒有两位总统占有路名，一条法租界美国领事馆前的威尔逊路，一条大智门火车站前的罗斯福路。前者成为今天车站路靠江边的一段，后者在1953年更名为京汉路。

紧挨京汉路的循礼门北边，还有梅神父路及梅神父纪念医院，发端于一桩有关意大利传教士的“梅占春事件”，也在1953年更名为江汉北路和武汉市传染病医院。

“洋人路”在租界陆续收回后相应更名，最终在新中国初期彻底结束，一洗百年屈辱。其中，福熙大将军路更名为蔡锷路，霞飞将军街更名为岳飞街，中国将军当仁不让替代外国将军，可谓神来之笔。

路名关乎国家主权，对于维护领土完整、体现民族尊严、传承历史文化、彰显城市个性，无不意义重大。以人名作路名，又赋予了纪念功能。因而，以张自忠、郝梦龄、刘家麒、陈怀民等命名抗日英烈路，昭示抵御外侮的烽火不息。中山大道、中山路、黄兴路、蔡锷路，则回荡辛亥革命的风云叱咤。而张之洞路和黎黄陂路，也留下近代转型的鲜明印记。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 菲 杨 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刘海燕

李文洲 李敏娟 张冰峰 张智勇

陈红英 林 伟 唐云峰 谭艺琴

潘红莲

主 编：阮祥红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 行 主 编：丁星火

特 约 编 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 濛

编 辑：刘 玮 章旷怡

封 面 设 计：王 鹏

阅城偶记

<<< <

1 “洋人路”一去不复返 / 简 桦

时代年轮

<<< <

4 1965，十三个工业区星落三镇 / 王 钢 韩泽宽

风雨同舟

<<< <

11 向世界展示温暖而坚定的中国力量

/ 刘淑华（口述） 许 濛（整理）

九城同心

<<< <

15 鄂楚风骚逐江流（下）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鄂州元素 / 邱 风

委员天地

<<< <

19 我的创业路与履职情 / 解 勇（口述） 银 华（整理）

23 一叶一世界 叶间绘美好 / 叶晓秋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 <

27 母亲的酸梅汤，熬出的奋斗与传承

/ 曾 黎（口述） 熊一雄（整理）

烽火江城

<<< <

31 名流荟萃：抗战名人故居

——武汉抗战遗迹巡礼之三 / 邓正兵 王 钢

35 鹰击长空（下）——“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十 / 涂文学

41 加拿大护士尤恩的“抗战三镇行” / 王汗吾

46 中国深山里的教育事业 / 骆传芳 骆夏露德 / 撰 付强 / 译

人物述林

<<< <

53 我与爱国侨领司徒眉生的交往 / 孙君恒

都市寻踪

<<< <

56 武汉杂技团出访南亚五国（上） / 何忠杰

60 何以同济 / 马先松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1965，十三个工业区星落三镇

◇ 王 钢 韩泽宽

轮印：60年前的1965年，武汉建成十三个工业区，由“一五”重点项目“武字头”企业担当龙头，形成轻化工业聚集汉口、机械与建材工业集中汉阳、重工业云集武昌的鲜明格局，一举跃为国家重点工业城市。

当人民共和国朝阳初升，武汉迎来一场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踏上从传统工商业城市向现代工业城市的历史性转折之路。

“一五”“二五”时期，重点建设项目和工业区布局的宏图渐次展开，国家战略的如椽之笔，在这片新兴热土烙下了重重印记。武汉钢铁公司铁流奔涌，武汉重型机床厂机器轰鸣，武汉锅炉厂热气蒸腾……一批“武字头”企业拔地而起。到1965年，十三个工业区形成完备的工业体系，星罗棋布长江两岸。从此，武汉的经济脉搏与国家工业化的步伐同频共振，为华中重镇铸就坚实强壮的工业筋骨。

“一五”时期：五个工业区崭露头角

武汉近代工业起步之早、规模之大、门类之全，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留下鲜亮的一页。清末民初，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湖北纱布丝麻四局、既济水电公司、扬子机器厂、燮昌火柴厂等官办民办工业企业纷纷建成，初步构筑出近代工业体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企业内迁，武汉工业基础严重削弱。沦陷时期，日军对武汉经济的统制与掠夺，使之受到极大摧残，城市经济沦落于殖民化境地。抗战胜利后，虽有部分工厂回迁武汉，但工业终不复往日，大多企业陷入停产或濒临破产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1949年10月5日，中共武汉市第一次代表会议提出“把武汉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城市”的奋斗目标，为武



1958年9月13日，武钢炼铁厂一号高炉建成投产

汉工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能。历经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武汉原有工业得到恢复、改造和扩充，各种主要工业产品均超过历史最好水平。195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4.32亿元，比1949年增长1.2倍。

从1953年1月起，国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项目为中心，以694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体系。

为发挥武汉这座中心城市的重要作用，并改变以往重工业布局不合理及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党和国家把重点发展的目光投向武汉，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中的7项落户武汉，包括武钢、武重、武锅、武船、武汉肉联、青山热电厂和武汉长江大桥，旨在把武汉建设成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揭开了武汉现代工业腾飞的序幕。

《1953—1957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在充分发挥现有设备能力的前提下，扩建和新建一部分地方工业。1953年，《武汉市城市规划草图》规划城区面积为433平方公里，制定9个工业区、1个高教区、1个行政区、1个风景区和长江大桥、汉水公路桥址的规划方案。按照“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根据工业用地的发展需要和自然条件，在武汉三镇分散布局、成片建设不同性质的工业区：武昌，开辟以武钢为核心的青山工业区、以武锅为主的石牌岭工业区，在筹建武重的过程中又形成答王庙工业区；汉口，建设以武汉肉联为中心的堤角工业区；汉阳，形成以木材加工、机械制造为主的庙山工业区。至此，武汉大工业城市的基本构架开始搭建起来。

武汉工业区的布局，具有一定规律性。钢铁、重型机床、船舶制造、工业锅炉等重工业集中于武昌，分布在远离市区的沿江、沿河、沿湖地带；轻工业则分布在离市区较近的内湖附近。布局充分考虑水系的运输优势，并远离老城区以减少污染与干扰。其中，青山工业区从选址到规划都由苏联专家担纲完成。1954年3月，苏联国立冶金工厂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院长别良其可夫率专家团，到湖北实地踏勘后选址青山建钢铁厂，原定在此建设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为之让路。

1955年6月，国家正式批准武钢第一期工程的初步设计。长江之滨，武汉东郊，十里钢城在荒野中拔地而起。1958年9月13日，武钢一号高炉炼出第一炉铁水，毛泽东主席登上炉台，亲自目睹这一历史时刻。他说：“武钢有六万五千人，像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型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业等。这样的大型

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武钢誉为“新中国的钢铁长子”，打破了以往重工业聚集东北、钢铁工业“北重南轻”的不平衡局面，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钢铁要过江”的战略布局。以武钢为核心，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冶金机修厂、青山热电厂等先后建成，形成规模宏大的青山冶金工业区。

“一五”期间，武汉工业建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武锅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和建设的大型锅炉制造企业，1956年动工，1960年投产，成为全国生产电站锅炉的五大骨干企业之一。以武锅为基础，武汉灯泡厂等多个机械、电器工厂相继聚集，形成了石碑岭工业区（又名钵盂山工业区）。

答王庙工业区（又名中北路工业区）位于武昌中北路答王庙地段，其核心是由国家投资、苏联援建的武重。1955年9月动工，1958年6月建成，是国内建设最早、最大的重型机床专业制造厂。以武重为主体，答王庙工业区陆续增添了武汉手表厂等精密机械工业企业。

这一时期，汉口的工业区以轻工业为主。堤角工业区以武汉肉联为基础形成，濒临长江与朱家河汇合处，是我国第一座新型肉类联合加工厂，引进苏联最新设备。在汉阳，虽未有“一五”重点项目落地，但武汉国棉一厂、汉阳钢铁厂早在“一五”前即开始建设。在汉阳大道以南，今马沧湖路与翠微路之间的荒郊地带，一批枕木防腐、冷冻机、水泵等制造企业聚集，形成以木材加工、机械制造为主的庙山工业区。



1950年代，武汉重型机床厂鸟瞰

1957年，武汉工业总产值14.57亿元，为1952年的2.64倍，已能生产成套的工业设备、小型动力设备、电器仪表及农业机械，转变为内地重要工业城市。1957年11月，武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宣布：“一五”期间，武汉市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已经开始形成社会主义工业城市。

武汉新辟工业区，使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跳出旧城范围，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形态，呈现多点开花的发展格局。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时，武汉城区面积从1952年的37.7平方公里，增加到107.97平方公里，扩大两倍。

“二五”时期：新工业区跟进发展

1958年7月，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在庐山召开全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武汉市地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核心是规划新建、改建、扩建项目196项（通称“200项”）。受大跃进“左”的错误影响，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脱离实际，存在贪大求全、战线过长等问题，但反

为工业建设的重点，并把化学工业作为冶金、机械制造工业之后的第三个重点项目。1958年8月，武汉第一个大型基本化工原料企业——葛店化工厂动工兴建，1959年3月投产，主要生产氯碱、化工原料和多种农药。以葛店化工厂和武汉化工二厂等企业为主的葛店化学工业区应运而生。此外，武昌还建成以461（武汉船用机械厂）、471（武汉重型铸锻厂）为主的武东机械工业区，以木材厂为主体的白沙洲建材工业区。

纵观汉口，西边以轻工、化工、中小机械类为主的易家墩工业区（又名古田工业区）形成，包括武汉无机盐化工厂、制漆厂、制氨厂等，与北缘以轻工、机械类小型企业为主体的唐家墩工业区遥相对望。

在汉阳，原有的庙山工业区与月湖东畔的工业企业在地域上融合，形成以汉阳钢铁厂、汉阳客车制配厂、武汉小型拖拉机厂等为代表的七里庙冶金机械工业区。在沿江的鹦鹉洲地带，则形成以港口机械、建材行业为主体的鹦鹉洲工业区。

1959年8月12日，李尔重在《人民日报》发表《工业区·风景区——武汉》一文，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描绘了武汉壮美的城市景观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武汉到底是个什么城市呢？”作者在引导读者游览武汉三镇的风景区时，特意带领读者领略蓬勃发展的各大工业区：“把你送到珞珈山路，那里有武汉锅炉厂，送到关山，那是1958年用了六个月时间建筑出来的一个新工业区，那里有鼓风机厂、综合电机厂、汽轮机厂、轴承制造厂。把你再送到葛店，那里是一个化学工业区；再把你送到武昌到青山的二干道上，你会看到正在兴建的国棉二厂、纺织机械厂；到了汉阳，你没有办法再找到旧汉阳了，一片新的机械工厂兴建起来……顺着长

江往下游望，左岸有一个高大建筑物，很象一座大洋楼。你会奇怪：‘什么人会在那里盖一座办公楼呢？’是的，那不是办公楼，那是肉类联合加工厂（汉口堤角工业区内），一座现代化的屠宰工厂。”文末有感而发：“武汉不单是革命圣地、交通中心，而且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个强大工业基地”。

“二五”计划完成时，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全面建成投产，成为武汉现代工业体系的骨干和核心。武昌造船厂、710厂、武昌车辆厂、武汉电讯电源厂、汉阳枕木防腐厂等也按计划建成，武汉周边12个近郊工业区、1个远郊工业区已奠定基础。

1962年12月，武汉市第四次党代会指出：武汉市“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基础已经初步奠定了”。

再接再厉：十三个工业区蔚为规模

1963至1965年，国民经济从大跃进“左”的冒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得到恢复和发展。1963至1965年，武汉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0.7%。在此期间，武汉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加快发展纺织工业，以几大纺织厂为主体的武昌余家头工业区继续扩充规模。

余家头以南，解放前是震寰纱厂、裕华纱厂所在地，具有深厚的纺织工业基础。1950年，震寰纱厂实行公私合营为武汉国棉五厂，裕华纱厂后来改组为武汉国棉四厂。1965年9月26日，武汉第二棉纺织厂建成投产，使全市棉纱生产能力提升三分之一，成为余家头纺织工业区的标杆企业。

1963年以后，武汉进一步加强各具特色的区域工业经济建设，硚口区以发展汽车



武汉第四棉纺织厂大门

及配件为主，江岸区以发展低压锅炉为主，青山区以经营冶金设备、高中低阀门为主，江汉区以生产仪表、电机电器、电线电缆、工具器具、精密制造等基础元件为主。到1965年，全市基本形成青山、余家头、答王庙、钵盂山、武东、关山、葛店、白沙洲、堤角、唐家墩、易家墩、鹦鹉洲、七里庙等13个工业区，建成13个专业生产体系和3大支柱产业。

以重点骨干企业为主体的新工业区的崛起，为武汉成为全国重要工业基地之一铺就坚实的基石，使武汉享有“新中国工业骄子”之称。1964年9月30日，市委机关报《武汉晚报》头版发表《武汉已经奠定了强大工业基地的基础》一文指出：“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城乡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武汉人民经过十五年的努力，使武汉市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了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从根本改变了城市面貌。以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大大发展了，彻底改变了过去不产铁、不产钢、不能制造一台像样的机器，不生产任何一种化工原料的落后面貌……市政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城市四郊建立了许多新工业区和新市区。”

武汉原有工业布局不合理，工厂与商业区、居民区混杂相处，市区内企业大多数占地狭小，生产布局难以展开。而13个工业区的布局，新建、重点、大型项目如“武”字头企业集中于武昌、青山；同时，在汉口、汉阳开辟新工业区，形成较为合理的工业发展格局。

在点线安排上，为了运输便利，新建项目主要沿江、沿铁路线和市郊展开，如青山、葛店、余家头、白沙洲、鹦鹉洲等工业区位于长江

沿线，答王庙、钵盂山工业区在铁路沿线，关山、堤角、唐家墩、易家墩、七里庙等工业区处于市郊。

在体系建设上，改变过去分散零碎的状况，形成冶金、通用机械及冶金设备、汽车与拖拉机、造船、电力设备、无线电及仪表生产、工作母机及工具、化工、制药、建筑材料、纺织、轻工业、准备件等13个专业生产体系，构建起冶金、机械制造和纺织3大支柱产业，而且轻重工业比例趋于协调，改变了过去没有多少重工业的局面。在武汉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占比1958年达33.6%，1965年达44.9%，与武汉作为国家工业基地、华中工业原材料中心的地位相称，符合中央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要求。

13个工业区的形成，带动了武汉城市的发展和转型，促成了两江三镇联动发展的空间格局。围绕13个工业区衍生出卫星城，最终实现新城区与老城区融为一体，引领了城市空间的向外拓展，城市面貌也由此焕然一新。

在汉口，解放大道穿针引线，将易家墩、唐家墩、堤角工业区连成一条三点长轴，城



武汉 13 个工业区分布图

区突破解放大道和沿江大道之间的狭长地带，往北纵深发展。汉阳城区则分别沿鹦鹉洲、七里庙工业区向西向南扩张，呈现“7”字形发展态势。武昌城区以旧城为发展极，一边沿武珞路、珞喻路方向东扩展，连接了石牌岭和关山工业区；一边沿和平大道向北拓展，沿江形成一条连接武昌旧城—余家头纺织工业区—青山工业区的三点一线生长轴线。

在大工业生产背景下，为解决职工的住房需求，武汉市按照“统一规划、总体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学习苏联建设经验，修建了大量工人新村。工人新村是相对独立、功能完善的综合性城市居住单元，规划工整又错落有致，造型简朴但拥有集中成片的绿地作为公共空间，周边有学校、商场等配套设施，成为武汉多元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红钢城自成一体，居住超过 10 万人。

时代更迭，产业变迁，六十载岁月如歌，当年工业区的许多厂房早已停止机器轰鸣，但其凝结的奋斗精神、建筑美学与集体记忆，已沉淀为江城的深层工业基因。

“武字头”大企业纷纷合并或搬迁。武钢、宝钢两大集团合并。武重搬迁至佛祖

岭。武锅被法国阿尔斯通公司收购，迁至江夏何家湖。昔日钢水奔流的青山冶金工业区，蜕变为循环经济与现代新材料融合发展的产业高地，碧水蓝天取代钢铁森林。关山机电基地的血脉，已深深融入光谷“光芯屏端网”的万亿产业集群。

一些工业区腾笼换鸟，为新兴产业提供现成发展空间

与产业根基。答王庙、余家头工业区，成为武昌滨江商务区和滨江数创走廊的重要载体，为武汉从“制造”走向“智造”赋能。一些工业区则成为火种，续写辉煌。葛店化工厂顺应时代转型，向文体文旅教育、生态能源化工、科创金融资本等多业态布局发展。白沙洲工业区建成为以现代机电设备制造为主导，融合各类居住、商业和社会公共设施的都市工业区。

一些工业区走入历史，但老厂房经“工改居”“工改商”，融入现代城市建设。2007 年，武汉肉联与武汉万吨冷储携手重组，堤角工业区变身食品储存、批发市场，见证了众多知名品牌的崛起。一些披上现代艺术的新衣，变为工业遗产创意园区。武钢红房子及一号高炉、青山船厂、武重、武锅等旧址，共同组成“一五”156 重点项目的工业遗产群，为游客呈现独具特色的武汉城市工业遗产景观。

王钢，武汉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
韩泽宽，武汉图书馆助理馆员

向世界展示温暖而坚定的中国力量

◇ 刘淑华（口述） 许 濛（整理）

人物名片：刘淑华，九三学社武汉市教育卫生专门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副主任，小儿烧伤学科带头人，国际烧伤外科学会（ISBI）会员，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创面修复分会常委。

2001年12月，秘鲁首都利马市发生重大火灾事故，受国家卫生部派遣，武汉市第三医院组建医疗队，九三社员、三医院烧伤科主任谢卫国带队代表中国远赴南美支援。短短三周时间，医疗队参与和指导治疗烧伤患者百余人，示范和指导手术数十台次，利用全球独创的喷撒法皮粒播植术等技术，成功救治多名令当地医生束手无策的危重病患。精湛医术赢得国际同行尊敬，受到秘鲁政府和我国外交部的高度赞扬。

我是在谢卫国主任的引领下加入九三学社的。他是我的领导，更是我医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2025年7月，当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发生空难，造成百余人伤亡的消息传来时，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24年前谢主任奔赴秘鲁



2001年谢卫国主任在秘鲁当地医院查房

的情景。在中国外交部紧急派遣下，武汉市第三医院组建医疗队前往救援，我主动请缨带队出征，这不仅是对前辈脚步的追随，更是九三学社爱国精神的延续。

驰援孟加拉：跨越国界的生命接力

7月21日，一架孟加拉国空军教练机不幸坠毁，造成30余人死亡，超百人烧伤，其中大多数伤者为中小学生。这场突如其来的坠机事故牵动人心。中方迅速响应，根据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市卫健委指示要

求，三医院迅速组建医疗队赴孟执行跨境医疗救治任务。

23日，我们最初接到的是关于药品援助的请求，但我意识到此时此刻比药品更稀缺的是医生。因此，我主动请缨，表示愿意协调组队奔赴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我和其他4名资深医护人员组成烧伤重症与儿童烧伤医疗救治医疗队。24日上午，在省市外办多方统筹协调下给我们快速办理因公出国手续，搭乘航班经北京中转，于25日凌晨抵达达卡。

25日清晨便投入工作，我们与孟方专家及来自新加坡、印度的医疗团队进行联合会诊，在孟8天期间，每日奔赴孟加拉国家烧伤与整形外科研究所，对极危重及重症患儿开展MDT讨论、床旁查房、伤情评估及手术指导，并为多名患者行动静脉穿刺、清创换药、床旁B超等诊疗操作，给予创面管理、烧伤康复及营养指导。

四国医生在这里相当于一个国际医疗联盟，这里只有一个目标：争分夺秒抢救病人。手术室内，我们的手术吸引了其他医护人员的关注。在一场植皮手术中，已有8年工作经验的住院医生苏尼认真观察着我方医生的操作，并不时询问具体细节和原理。



医疗联盟成员的合影

期间我们还开设了一场专题讲座，向各方系统地分享中国烧伤诊疗、整形与康复管理经验。这是国际医疗合作的实操，是兄弟间的并肩作战，也是各国医疗理念、技术和体系的交流。

“谢谢你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帮助我们救治伤员。”在达卡的国家烧伤与整形外科研究所，我们经常收到当地民众的感谢。

7月31日，我们完成救治任务启程回国。在孟期间，共计参与救治22名患者，其中包括7名危重患者，并完成10台重症患者的手术。

结束救治任务后，孟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尤努斯会见我们，代表孟政府与人民向中方表达诚挚谢意。尤努斯说，中国是孟加拉国真正的朋友，希望孟中两国加强医疗领域合作，为民众带来更多福祉。

不止于救治：走进患者的心里

从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余年来，我救治来自全国各地的危重烧伤患者逾千例，率领团队救治来自省内外的烧伤患儿近万例。我深深体会到，烧伤患者的痛苦远不止于身体上的创伤。他们面临的是漫长的康复过程、沉重的经济负担、终身难以抹去的疤痕和心理阴影。很多时候，救治一个患者，就是挽救一个家庭。

我记得2006年收治的一个叫衡川的孩子，当时他还不到7岁，因为一场意外导致全身100%面积烫伤。在5个多月的治疗期间，他闯过了无数个鬼门关，成为国内外治疗成功的烧伤面积最大、病情最重的患儿，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但出院只是第一步，我们对衡川的支持，从未间断。因为没有学校愿意接收这个

疤痕遍布全身、肢体残疾的孩子，我们就多方努力联系学校，还去学校做宣讲，减少同学们对他的异样目光和误解。中考过后，为了方便衡川上学，又四处联系，衡川最后顺利入学离家最近的高中。2017年，更是为衡川争取到免费赴美治疗的机会。

在美国的18个月，衡川不仅在外观和功能上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自卑自闭、沉默寡言，变得心态平和、交谈自如。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衡川在美国进一步学习英语，参与社会活动，结交新朋友，人生迎来了全新改变。这个过程让我明白，医学的温度不仅体现在技术的救治上，更体现在心灵的重建中。

基于这样的认识，2008年10月，我们发起成立了国内首个烧伤患者互助组织——华中烧伤病友会。12年来，通过患者互助、医护帮扶、线上交流、线下活动等形式，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病友会开创了国内烧伤患者心理康复和社会支持的先河。

2010年，在谢卫国主任的倡导下，九三学社武汉市社委与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协助发起成立了国内首个烧伤妇女儿童专项救治基金——华中烧伤妇女儿童救助基金。至今已资助100余名贫困妇女儿童，为那些因贫困而难以救治的患者带去了重生的希望和爱的温暖。包括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晚期妊娠烧伤妇女母子、因治疗费用困难遭父母遗弃的男孩岳文甲、养母捡垃圾养大来换脸的少年赵雪成等。

除了这些公益项目，我还带领团队长期与湖北慈善总会、中华儿慈会9958等平台合作，帮助烧伤患儿筹集资金，抢救生命，成为省内外患儿及家长心目中的“救命恩人”。



迎接重度烫伤患儿小康康

2022年8月13日，抖音平台上10小时全程直播1岁的河北沧州烧伤重症患儿“小康康”千里转诊到三医院烧伤科救治。当救护人员、家长在转运途中得知我们团队已经周全地为孩子的病情评估及诊疗、营养喂养方案级护理提前组织了全院多学科会诊，甚至医护人员自发捐款已安排好家长住宿诸多细节，连连感慨我们的专业性和人文关怀。

当看到我在医院大门口第一时间迎接和评估孩子病情的时候，主播更是动情地惊呼：“武汉不愧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第一次看到三甲医院的主任亲自在医院门口迎接重症患者……”

作为湖北省烧伤与创面联盟秘书长及武汉市科普专家组成员，我还组织团队深入学校和社区，开展地毯式的烧伤预防与急救知识培训。预防胜于治疗，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同样重要。

在九三学社的平台上，我积极推动烧伤预防科普、心理康复支持、国际医疗合作等工作。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患者感受到：生命虽有创伤，但永远值得被温柔以待。

三医人：一座医院，一种精神

2006年，我被公派到德国留学读博，临近毕业时，德国导师希望我留在德国发展，我也曾犹豫过。那时国内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医生的待遇也不高，加上对孩子教育的考虑，我确实动摇过。甚至已经拿到了美国签证，考虑去美国发展。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回国，回到武汉，回到三医院。因为我深知，这里才是能让我实现医学理想的地方。

回顾五十多年前，作为工业重镇的武汉，烧伤患者增多，但少有医院设置专门的烧伤专科和专科医生，因烧伤失去生命的患者不在少数。

1970年3月，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应运而生，成为华中地区最早开设的烧伤专科。彼时的烧伤科，只有一间小小病房，5张简陋病床和8名医护人员。三医人从零开始，在挽救生命的征途上开始拓荒。经过一代代三医人的努力，一道道难题被攻破、一项项新技术被创造。我很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这座应答“生的渴望”的医院里，诞生多个世界级“首例”“第一”：成功救治世界首例百分之百特重烧伤患儿；成功完成国际首例严重电烧伤后断肢交叉再植；成功研发国内首例烧伤截肢患者3D打印手……一个个奇迹般的医学成就，彰显三医人对生命的最大尊重。

三医院烧伤科还承担了国内外大量烧伤应急救援任务。从湖北到全国，从国内到国外；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从江苏昆山到秘鲁利马、再到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在需要拯救生命的重大危急时刻，我

们一直在现场。团队中的每位医务人员的工作近乎是军事化节奏。手机24小时待机，1小时内赶到医院参加抢救，都是常态。

作为省级应急救援专家，2021年端午节，正在医院加班的我接到十堰613爆炸伤员救援任务，我甚至没来得及携带行李，立即从武昌赶往汉口火车站，2小时后就与同事气喘吁吁地登上了飞驰的火车。作为第一批到达的救援专家，我们首先巡查三家医院集中收治的成批重度烧伤患者，给予及时、专业的病情评估和诊疗指导方案，为抢救患者赢得了时间，确保了每个烧伤患者最终的成功救治。

在回应“生的渴望”中，三医人从未停止脚步，救治能力不断提升，救治领域不断拓深拓广……率先在全国设置一批亚专科医疗单元，分门别类开展烧伤重症监护、小儿烧伤、成人烧伤、慢性创面及烧伤康复治疗。率先将显微外科、修复重建外科及整形外科等交叉学科技术综合应用，帮助患者身体的功能和外貌得到明显改善。

回顾这些年的从医经历，能够在三医院这个有底蕴、有担当的平台工作，能够在九三学社这个重视科技创新、关注社会服务的组织中成长，能够代表国家执行国际医疗救援任务，这些都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年轻的医学生们：医学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人学；医生不仅要治病救人，更要心怀天下。我们要用精湛的医术治愈身体的创伤，更要用温暖的人文关怀抚慰心灵的痛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才能向世界展示温暖而坚定的中国力量。

鄂楚风骚逐江流（下）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鄂州元素

◇ 邱 风

一代宗师：潮头开先派

岁月在鄂州，沉淀着两位宗师的传奇足迹——葛洪与慧远。一位炼丹问道，一位弘扬佛法，虽追求殊途，却同样在鄂州开宗立派，为长江之滨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

道教丹鼎派创始人葛洪（283—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市）人，东晋道教学者、炼丹家、医学家，因崇仰黄帝、老子之道，世称“小仙翁”。据史料与传说，葛洪曾至少两次寓居

鄂州：一次在东晋永嘉年间（307—312年）驻足武昌，另一次约在西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同妻子鲍姑及岳父一起寓居武昌。这里临江抱湖的风水与独特地理环境，吸引他在江边山麓结庐炼丹，潜心钻研医道，将毕生所学著成《抱朴子》，不仅推动古代化学与医药学发展，更开创南方道教丹鼎派先河。他留下的炼丹遗址与传说，让鄂州的葛店、葛山、洪港、葛仙镇、斗牛观等地，至今仍弥漫神秘道家气息，成为后世探寻道教文化的圣地。

佛教净土宗鼻祖慧远（334—416年），俗姓贾，出身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

书香门第，自幼博通六经，尤善老庄之学。青年时偶遇高僧道安，感悟佛法精妙，毅然出家。东晋太元六年（381年），慧远南下弘法，途经武昌（今鄂州），见这里寒溪潺潺、西山苍翠，被静谧灵气触动，遂决定驻锡。先住寒溪寺，后于西山吴王避暑宫创西山寺，因寺前古井内现佛光，亦名古灵泉寺。

武昌是江南最早传播佛教的地区之一，也是较早修建佛寺的地方。慧远在此广纳门徒，宣讲佛法。他结合《无量寿经》等经典，倡导“念佛三昧”，主张以称名念佛为修行方式，以往生西方净土为宗旨，正式创立佛教净土宗。以通俗易懂的教义吸引众多信徒。三年后，他沿江而下抵庐山，于东林寺建立莲社，精修净土法门，将净土宗教义传播至大江南北，使之成为中国佛教影响最深远的宗派之一。

英雄志士：激流见胆识

熊桴：“寒溪砺刃”家国情

熊桴（1507—1569），字元乘，武昌内乡（今鄂州太和镇）人。少年时在西山吴王避暑宫苦读，立志报效家国，常以溪水磨砺刀剑，留下“寒溪砺刃”典故。据说他曾在上学路上遇猛虎拦路，当即厉声呵斥：“我钟山川之灵，当捐躯报国，岂为尔食！”猛虎竟俯首退去，这段“叱虎”典故成为鄂州民间佳话，后人在西山青龙岗建“伏虎楼”纪念。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取进士，任太仓知州。时倭寇犯境，围逼州城，兵力不足的他命百姓擂鼓呐喊、城墙遍插旌旗，用空城计逼退敌军。他训练乡勇使用改良的鄂州渔叉，后演变为抗倭利器“熊公叉”，并将鄂州渔民的“倒须笼”战术应用于海防，

在崇明岛用竹笼陷阱俘获倭船7艘。其创制的“水陆轮戍法”，正是借鉴鄂州沿江地区“农时耕田、汛期巡江”的传统。他转战东南沿海十二年，先后剿寇三十余战，斩倭3400余人。年过六旬，熊桴仍带病迎战倭首曾一本。曾一本与日本某兵团兵匪一家，屡犯惠州、潮州一带，熊桴领军迎战，三战三捷，活捉曾一本。不久卒于军中，朝廷赞其“以死勤事”，追封副都御史，赠兵部左侍郎。

熊桴生前最后一次返乡，曾登西山手植松柏二十株，留下“倭患不息，此根不枯”的誓言。逝世后归葬鄂州新庙镇茅草村。熊桴墓被鄂州市人民政府设立为保护展示区，墓前两尊明代石马已成为爱国主义实物教材。

张之洞：黄金水道兴鄂州

1890年，张之洞督办湖北炼铁厂，特别批示：“武昌县（今鄂州）滨江之利，当为汉阳铁厂之羽翼”。这一决策使鄂州三江港成为汉冶萍公司核心中转站，催生鄂州首个近代码头装卸体系。

张之洞将长江视为“活体铁路”，其“分段运输”策略惠及鄂州：小型民船从樊口集散农产，中型轮船转运矿产；1897年建成的鄂州水文观测站，更开创性将水位数据用于调度汉阳铁厂燃料运输。据《武昌县志》载，至1905年鄂州沿江已涌现17家机器碾米厂，皆受益于张之洞的“官督商运”政策。值得提及的是，1902年鄂州商会在其支持下成立，章程明确规定“凡议决事，须经长江航运代表联署”，凸显鄂州水运业的核心地位。

张之洞的西山文脉情怀令人难忘。西山九曲亭为孙吴遗迹，自北宋苏轼重建后，屡建屡毁。清同治十年（1871年），时任湖

北学政的张之洞视察武昌，捐资主导重建工程，并将明代所称“怀坡亭”恢复“九曲亭”旧称。他亲撰楹联挂于两边抱柱，还作《登九曲亭望吴王故城》诗一首：

前带平江后枕湖，山林葱倩旧吴都。

西龕北拒喧腾过，草棘寻幽到二苏。

张之洞主政湖广期间，常借西山凭吊苏轼。他在西山捐建的寒溪学堂（今鄂州寒溪中学前身），校内“景苏廊”陈列苏轼西山题刻拓片，教材选用苏轼西山唱和诗作，将东坡文化遗产纳入近代教育体系。九曲亭经张之洞修复后，成为三国孙权遗迹（始建）—东坡精神符号（宋代）—洋务遗存（清代）的三重历史见证。今日亭前石刻“苏子遗亭”四字，仍为张之洞幕僚张曾畴手笔，标志着两位变革者对鄂州文脉的共同守护。

首义三雄：辛亥革命长江魂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巍峨里程碑。在这块纪念碑上，刻写着众多鄂州籍英雄志士。据统计，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鄂州籍志士，有名有姓、到村到湾的有139位。鄂州有参加武昌首义超过50人的乡镇，有超过10人的村湾，还有多个参加首义的三兄弟、两兄弟。

“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的彭楚藩，1884年生于鄂州市华容镇凉亭村，又名家栋，字青云。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筹建时，被推为军事筹备员，筹划起义。1911年10月9日，因指挥部机关暴露，清廷湖北当局宣布全城戒严。彭楚藩得知后，赶至指挥部与蒋翊武等人商议，决定夜半发动起义。首义前夜的10月10日凌晨，他率新军控制长江舰船，切断清军水路增援，被捕就义，年仅23岁。1956年11月15日，湖北省政府公布彭楚藩烈士墓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鄂州城区有其纪念馆，武汉市有他与

刘复基、杨洪胜并称的“彭刘杨路”。

首义总指挥吴兆麟，1882年2月28日生于鄂州，字畏三，号宽元。武昌起义爆发时，被推为湖北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果断指挥攻打湖广总督府，占领武昌城。起义成功后，担任湖北军政府参谋总长，参与汉阳保卫战。民国成立后，出任北伐第一军总司令，后调至北京任总统府军事顾问，授陆军上将衔。1913年秋退出政坛，致力于慈善与教育事业，曾督修鄂州樊口大堤等水利工程，并捐资修建武昌首义公园。晚年潜心佛学，拒绝日伪诱惑被软禁。1942年10月17日病逝，享年60岁，公葬于武昌伏虎山。

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程正瀛，1885年生于鄂州市泽林镇大山村，又名定国。清末入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当兵，深受革命思潮影响，积极参与文学社和共进会等反清革命组织活动，后任工程营革命军第五支队队长。他积极响应孙中山民主革命号召，秘密联络同志，共谋反清大业。原本起义指挥部决定1911年10月16日起义，该日农历八月十五，暗合元末“八月十五杀鞑子”传说。可10月10日晚，起义事被清廷察觉，当清军排长陶启胜前来查铺时，与班长金兆龙发生冲突。程正瀛闻声赶来，用枪托猛击陶启胜头部，致其负伤逃走。随后，程正瀛果断开枪击毙前来增援的清军头目黄坤荣和张文涛。其英勇行为引发全面武装起义，标志武昌起义开始，揭开辛亥革命序幕。

建党三杰：星火燎原溯江行

万里长江一路向东，在中游鄂州段拐出一道历史弧线，浪花里沉淀着1921年前后三位鄂州赤子播撒的革命火种。他们如江心的航标灯，在惊涛骇浪中为中共早期党组织照亮前路。

李大钊的得力助手范鸿劼，1897年冬

生于鄂州葛店。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随即跟随李大钊参与创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并领导五四运动，被李大钊称为“最优秀的学生和得力助手”。他是中共四大20名正式代表之一，北方党组织核心领导人。同时，他把参与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藏在渔船夹层运往武汉，将革命火种带回家乡。1927年初回故乡葛店探亲，发动乡亲打土豪、斗地主。回北京后，被奉系军阀逮捕，4月28日与李大钊一起走向绞架，临刑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刊文悼念，称范鸿劼是“最英勇的战士”。这位革命先驱以“为主义牺牲”的坚定信仰载入党史。

湖北党组织的奠基者刘伯垂，1887年生于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清末留日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受陈独秀委派回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主持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参与组织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反对军阀统治、反日爱国、声援五卅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党的三大后，按党的决定，在武汉与董必武等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执行部，推动国共合作。在身染绝症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党的地下工作，多次假扮渔贩，在芦苇荡培训党员。1936年9月病逝，享年50岁，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火种传入湖北第一人”。

工人党员的革命先锋赵子俊，1886年3月生于鄂州华容镇贫农家庭。早年从军，后辗转纱厂、铁路务工。1921年春在武汉加入共产党组织，成为党早期罕见的工人党员。次年初，作为陈独秀派遣的37名代表之一，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曾带领数百鄂州籍工

人卧轨以示坚贞。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任第二分队长，时年38岁。1926年9月24日在北伐中壮烈牺牲。今天，在复建的江岸工人俱乐部里，参观者能触摸到用声纹技术封存的罢工口号，那些带着鄂州方言的呐喊，正与长江公园建设的劳动号子激越交响。

江声浩荡，驰骋英雄气；鄂楚遗踪，长存翰墨香。浪涛并未卷走千年岁月，却将无数故事镌刻在鄂州大地上。那些历史人物的名字，如同璀璨星辰，镶嵌在长江之畔，辉映广袤城乡。即将落成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也将成为承载这份历史荣光的新载体，让后人在领略长江壮阔的同时，触摸千年来奔涌不息的文明脉搏。

邱风，原名邱保华，鄂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退休干部；现为鄂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宣讲团”成员，鄂州市作协副主席

我的创业路与履职情

◇ 解 勇（口述） 银 华（整理）

人物名片：解勇，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永铭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党委书记、董事长。

这些年来，我常常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这片熟悉的土地，回想自己走过的路。从电力局的普通职工，到如今经营着多元化的集团，我深切体会到，人生就像一场接一场的考试。对我而言，最重要的考试有三场：离开“铁饭碗”的勇气、把小公司做成集团的坚持、从企业家到政协委员的转变。

创业路上的汗水与坚守

回想2004年决定创业的那一刻，我正处在“三十而立”的人生关口，在蔡甸区电力局的工作稳定安逸，但心里总有一股不安

分的劲儿。看着国家鼓励创业，特别是目睹身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我意识到，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无数的工地需要沙石、水泥和钢材。这个念头一旦生根，就再也挥之不去。我想，趁着年轻，为什么不拼一把？

那年春天，我拿出工作以来所有的积蓄，注册成立了武汉永铭商贸有限公司。创业初期，公司规模很小。人员，就是几个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发小；市场，更是需要从强手如林的竞争中一点点去啃。我们请不起工人，也买不起大型机械。为了省钱，从货场扛水泥、搬钢材到运沙石，全靠我们几个肩扛手拉，常常是晴天一身沙土，雨天一身泥浆。

诚信和拼命是我们唯一的资本。我给自己立下规矩：只要客户有需求，无论白天黑

夜，刮风下雨，都必须按时送到。至今仍清晰地记得2007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已经睡下的我，接到沌口一个还建房工地打来的紧急电话，说急需一批沙石。没有犹豫，我立刻骑上摩托车赶往料场。那时的路况远不如现在，坑洼不平，也没有路灯。心里着急，车骑得就快，一个不留神，连人带车冲进了路边的深沟里。当时只觉得左腿一阵钻心的疼，但心里惦记着工地的急事，硬是咬着牙扶起摩托车，继续赶路。

等协调好料场，把沙石准时送到工地，紧绷的神经一松懈，我才发现自己左腿裤子已被血浸透，人也瘫坐在地上站不起来了。后来被工友送到医院，缝了十几针。这道伤疤至今还在，左腿也因此不能负重，每逢阴雨天，就会酸麻疼痛，仿佛在时刻提醒着我创业初期的艰辛。

身体上的苦累还好说，经营上的抉择更考验人。公司成立的第一个春节，我接到了一笔沌口停车场工地的供应业务，这是我们创业以来的第一笔“大单”，我欣喜若狂，没细算成本就按平时的价格签了合同。没想到临近春节，人工费和运输费翻着跟头往上涨。如果继续履约，我这大半年辛辛苦苦挣来的家底将全部赔光；如果毁约，最起码还能保住本钱。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抉择。看着那些为了赚点钱放弃回家过年的工人们，我心里明白，我毁约容易，但他们可能就因为材料断供而面临罚款、倒闭，工钱也无着落。那个年三十的晚上，我送完最后一批货，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空荡荡的公司，听着窗外传来的万家团圆的鞭炮声，心里充满了酸楚。吃着母亲和妻子送来的饺子，各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第一次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错了。

没想到正是这个看似“失败”的决定，为我们赢得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元宵节那天，甲方老总亲自带着合同款来到我们公司，他握着我的手说：“小兄弟，我知道这笔钱不够你的成本，但你让我看到了你的人品和信誉。是你救了我们这个项目，救了一百多号人的饭碗。从今往后，我们工地的材料都由你供应，我给你预付款，你不用再垫资了！”那一刻，我百感交集，真正明白了“信誉无价”这四个字的分量，让我在以后的商海浮沉中，始终把“信”字摆在首位。

“左手托论语，右手托算盘”

永铭集团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大体上走过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凝聚着我们对市场、对责任、对未来的思考。

第一个阶段是创业和原始积累阶段。那时候我们像小船在市场的海里摸索，哪里能挣到钱就往哪里划，虽然方向不定，但始终有一条底线：诚实守信，奉公守法。我常常跟员工说，企业家要“左手托论语，右手托算盘”。中国人以左为尊，左手托着《论语》，意味着道义为上，要有利他之心，懂得感恩和回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右手托着算盘，不是要我们斤斤计较、唯利是图，而是要会精打细算。一是为自己算，通过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二是为合作伙伴算，站在对方角度帮他们节约成本，实现共赢。

正是秉持这个理念，如今我们集团有近亿元的债权，这些大多是合作多年的伙伴因暂时困难无法偿还，如果我们强行追讨，他们可能就垮了。我宁愿自己承担一些损失，也要给别人留一线生机，这既是对伙伴的情义，也是企业对社会的一种回报。

第二个阶段，我们开始明确市场定位，



奋战火神山工地

深耕建筑行业。随着业务和资源的积累，我们先后成立了多家建筑、市政工程公司。我之所以坚定地选择进军建筑市场，除了市场前景，更因为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发区的发展，让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他们需要就业岗位。作为从开发区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我觉得我们有责任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哪怕企业利润薄一点，自己累一点，也要尽力让大家生活得更好。这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责任。

这个阶段也是集团发展最快的时期，不仅在本土站稳了脚跟，业务还拓展到了武汉市乃至湖北省内其他地区。我们建起了自己的商品混凝土生产基地，不仅按需生产，还主动研发新产品，以满足不同工程的特定需求还投入巨资对生产线进行全封闭环保改造，引进污水处理系统，加装车辆冲洗装置。这些投入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但我

们不能只看眼前。忽略环保、安全和对产品质量的极致追求，企业或许能多赚三五年的快钱，但绝不可能行稳致远。

进入第三阶段，我们开始向多元化、集团化方向迈进。大概从2017年开始，我意识到，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随后便开始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高校合作，聘请专家顾问，组建自己的技术研发团队。截至目前，永铭已获得了50多项国家专利，并在2020年底被认证为“高新技术企业”，这是我们转型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现在，永铭集团已经发展成为集互联网科技、高效生态农业、文化传媒、休闲旅游康养和现代建筑五大板块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拥有近20家分（子）公司，员工约400人。

根植故土，回报社会

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便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更是社会的一分子，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我的生活很简单，几乎就是工作。公司步入正轨后，我培养了一支优秀的骨干团队，他们分担了大量日常管理工作，让我能腾出更多精力，去做一些更有情怀、更有意义的事。

首先是党建工作。永铭在2015年6月就成立了党支部，是汉南区“两新”组织里的第一批。我们坚持用党建工作引领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党员们在关键时刻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后来抗击疫情等重大考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次是公益事业。这些年，我们每年在公益上的投入近百万元，涉及扶贫、助学、



汉南区湘口街道汉江村

拥军、救灾、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其中让我投入感情最深、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参与乡村振兴。我们积极响应政府“三乡工程”号召，与湘口街汉江村党支部结对，共建美丽乡村。在那个村子，我们协助他们重新规划建设了水、电、路、文化广场、停车场、卫生室，完成了污水治理和垃圾分类，安装了路灯，美化了村容村貌。如今，汉江村422户村民的生活环境焕然一新，特别美、特别宜居！

光改善环境还不够，关键要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我们聘请了农业技术专家长期驻村指导，每年投入两百多万元，流转了村里三千多亩农田发展生态农业，每年带动就业三千多人次；还租赁了多套闲置农房，计划发展休闲农庄和健康养老产业。这些投入，助推了汉江村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经济健康和长远发展。

2011年，我当选为蔡甸区政协委员；2017年转任汉南区政协委员，后当选武汉市政协委员。这些荣誉，我倍加珍惜。履职期间，我积极参政议政，围绕民生、民企发展、经济建设等主题，提交了《关于支持区属民营建筑企业发展的建议》《关于发挥文

化名人效应，进一步打造汉南文化名片的建议》《关于进一步优化支持政策，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建议》等多份提案，很多都得到了政府的采纳和落实。

我始终告诫自己，要尽己所能，为国家、社会多办实事，为群众多办好事，这才不

辜负这个时代给予我们民营企业家的机遇和舞台。

最刻骨铭心的，是2020年那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岁月。疫情初期，集团业务基本停滞，损失巨大。在武汉最危急的时刻，我们主动请缨，与国企分包了部分基础建设任务。我和儿子解聪一起，带着200多名员工和30台大型机械，日夜奋战在工地。那十五天，仿佛比三年还长。工程完工后，我们父子又带着工人们在公司隔离。很多人劝我回家，但我知道，公司这个“大家”此时更需要我。

最终，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公司也被评为“湖北省抗击新冠疫情先进集体”。虽然经济上亏损严重，但能为国家抗击疫情争取时间，我们觉得值，这是永铭集团的责任，也是我们作为武汉一分子的担当。

一叶一世界 叶间绘美好

◇ 叶晓秋

人物名片：叶晓秋，汉南区政协委员、侨联副主席，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画家协会武汉委员会副秘书长、武汉市侨联委员、武汉经开区书画家协会副主席。

别人称我为“叶画大师”，其实我这一生，不过是守着几片叶子，琢磨着怎么把心里的念想画出来。回头一看，几十年匆匆而过，年轻时奔波谋生，后来在画室潜心钻研叶画，再到成为政协委员做些惠民生的事，每一步都走得实实在在。我的人生也像叶画一样，渐渐有了不一样的层次和韵味。

笔墨初心，叶上结缘

小时候家里务农，大人们在院子里种满了月季、茉莉，花开时满院飘香。我常

搬个小板凳蹲在花前，拿树枝在地上描画花瓣和叶脉，总觉得怎么画都画不够。父亲对我说：“画花要先懂花，要知道它什么时候发芽、开花，经历得起风雨，画出来才有魂。”那时年纪小，虽不太懂，却记住了作画要用心，不然画出来的东西就会没精气神。

1988年高中毕业后，我终于得以进入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武汉分校学画。可现实很快给我泼了冷水，学画需要的宣纸、颜料，对当时的我来说几乎都是奢侈品。在省吃俭用坚持一年后，我不得不辍学，但始终放不下画笔，总觉得手里有笔，心里才有希望。

为了凑钱买画材，我去码头当过搬运工，扛着几十斤的箱子，汗水把衣服浸透了一层又一层；也在工地做过小工，搬砖、和水泥，手上磨出的水泡破了又长，疼得钻心。可不管多累，每天收工回来看见桌上的



叶晓秋

画笔，就忍不住拿起来画几笔，哪怕只是勾一片叶子的轮廓，看着纸上的线条，一天的疲惫也仿佛随之减轻。

转机发生在1991年的一个冬日，那天我在街边摆摊卖画，站了一天几乎没卖出去几张。正准备收摊时，一位中年人停在我的摊前，指着一幅荷花图说，这画有灵气，别浪费天赋。在了解我的情况后，他推荐我去一家单位应聘，没想到我竟考上了，被分到单位办公室。上班第一天才知道，那位中年人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如果没有他那次的指点，我真不知人生会走向何方。

办公室工作期间，主要做宣传干事，日常画些宣传画、写点报道，日子十分安稳。之后岗位虽有变动，却从未停止创作。1993年，在厂领导支持下，22岁的我在汉南办了首次个人书画展。本以为生活会这么安安稳稳地过下去，没承想2004年单位改制，下了岗。那年我32岁，站在单位门口看着人来人往，心里空落落的。但转念一想，没了退路，不如就把画画当成后半生的饭碗。

起初我继续画国画，却总觉不如人。直到一位老画家点醒我，说我对植物纹理敏

感，何不试试在叶子上作画？2004年底，我开始拜师学习叶画。

汉南到处都是玉米地、荷塘，别人收玉米、挖莲藕，我却盯着那些没人要的玉米叶、荷叶发呆。这么好的东西，扔了可惜，说不定能做成有汉南特色的叶画。我先试着用玉米叶画乡土题材，在荷叶上画荷花，没想到效果还真不错，叶片的纹路跟画的内容特别搭。可新鲜叶子容

易烂、易褪色，怎么保存成了大难题。随后我又日夜试验，煮、晒、烘，大半年后终于摸索出8道工序，不加任何化学药剂，用7天时间就能把树叶变成耐用的画布，这套方法后来申请到4项国家专利。回想那段日子，虽然艰苦，却值得，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以画为生的人生道路。

叶间寻艺，造化自然

跟叶画打交道久了，慢慢就从靠它谋生变成真心喜爱。我开始把自己擅长的工笔花鸟画用到叶画里，每天在画室里琢磨，怎么把叶子和画融在一起。树叶的形状千奇百怪，比传统的方画灵活多了，有时候看着一片枫叶的锯齿边，灵感就来了，能画出一朵带露珠的杜鹃；摸着紫荆叶的心形轮廓，就想勾一张灵动的京剧脸谱。最妙的是，叶和画能合在一起，让人看着就觉得“叶中有画、画中有叶”，特别有意思。

我曾以一片深绿阔叶创作《听泉》，顺势利用叶脉作水纹，一道天然裂痕改为蜿蜒小溪；虫蛀的小洞，被我画上瓢虫，增添了



叶晓秋叶画作品《争艳》

几分生气。这时我的许多创作，已不是任务，而是与叶对话。我为叶画配诗装框，形成“内圆外方、方圆结合”的风格。一幅梧桐叶上的蔷薇，旁题“可怜细雨难胜日，照得深红作浅红”，深受亲友喜爱。

为寻合适的叶子，我几乎走遍了汉南的乡野田埂、湖边山坡，只要看到形状特别的叶子，就忍不住摘下来带回家。几年前，为创作京剧脸谱系列，我又专程赴广东、重庆寻找橡皮树叶和紫荆叶——前者厚实可承浓墨，后者心形更显灵动。旅途奔波，脚磨破了，但带回二百多片叶子时，满心欢喜。至今我收集的树叶已有数万片，储藏室成了“叶子仓库”。

叶画在朋友画廊中售出效果不错，甚至吸引了外国游客批量订购。2005年3月，我成立叶画艺术工作室，收徒七人，共同钻研叶画。我们在武汉图书馆举办展览，八十多幅作品前围满观众，看到大家眼中的喜爱，我深感欣慰。

浙江省残联从网上知道了我，邀请我去

浙江给聋哑人讲课，教他们画叶画，帮他们学门手艺谋生，我毫不犹豫答应了。这些残疾人虽然不能说话，但眼中的专注与渴望令人动容。一位女孩首次完成叶画时，激动地拉着我的手，眼中有光。那一刻我明白，这手艺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助人谋生、带来希望。我承诺以低价提供作品给他们销售，并远程指导，后来许多人得以改善了生活。

之后我创办了文化艺术公司，推动叶画走向国际。2005年起，我投入创作《叶画百花图》长卷，献给北京奥运会。原计划50米，后改为56米，象征56个民族。为找百种树叶，我遍访大江南北：云南山茶、江南荷、北京银杏、东北松针……精选几百片叶，每片依形设计，配诗钤印。三年日夜创作，2008年初得以完成。当长56米、重50公斤的画卷在画室展开，如花铺锦缎。该长卷最终以20万元被收藏，不仅是对叶画的认可，更是对坚持的肯定。

一次，去麻城采风，看见满山红杜鹃，听当地老人说抗战时许多青年在杜鹃花开时参军未归。我深受震撼，原来花叶之间，亦藏家国历史、民族精神，自此我更坚定“用画笔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我创作80幅花卉叶画，希望以花为桥，让年轻人感受历史，珍惜和平，汲取奋斗的力量。

对我而言，每片叶子都是一个小世界。它的形状、脉络，甚至虫痕，都能与艺术融合，成为亮点——这正是叶画之魂。

叶画传情，履职为民

2018年，我当选政协委员，心里既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能为百姓办些事，忐忑的是自己只是个画画的，怕做不好。后来跟



叶晓秋国画作品《淡妆浓抹迎朝日》

老委员们聊天，他们说：“履职不难，重在走心。”我牢记此话，作为此后委员履职准则。就像画叶画需懂叶性，履职也要知民心，才能把事做实。

记得有次，区委组织部和统战部派我到薇湖社区担任主任助理，参与基层协商。初到社区，不知从何做起，社区书记劝我多走、多听、多问，于是我每日随社区工作人员巡查走访。一位老党员反映健身器材老旧损坏，老人无处锻炼。我认真记录，协同社区联系街道及相关部门，反复奔波，最终更换并新增适合老人的器材。看到老人们锻炼时笑着道谢，我心里暖融融的，意识到百姓的认可最为珍贵。

社区里不少儿童因父母在外打工、跟着老人生活，性格都偏内向。有次去“四点半课堂”，我见到一个默默画花的小男孩，他说想妈妈。我带来树叶和画笔，握着他的手在叶上画金鱼。渐渐地，他话多了，画也越来越好。后来他画了一幅牡丹叶画，说要寄给妈妈，让她放心。自己的手艺能给孩子带来温暖，比什么都值得。

今年8月暑假期间，我联系区政协，在社区一同开展“委员伴童心，叶间绘美好”绘画活动。我带去了银杏叶、紫荆叶和彩笔。孩子们好奇叶子会不会烂，我解释经过8道工序处理，不会腐烂。又展示了脸谱、生肖叶画，孩子们不时惊叹。接着我用紫荆叶示范画荷花，孩子们很快上手尝试，我在旁指导构图调色。记得现场有个小男孩一开始总画不好花瓣，我拿过他的笔，跟他说：“你看这叶脉多像花的枝丫，咱们跟着它走，慢慢画，别急。”他跟着我画了两笔，眼睛一下子亮了：“叶爷爷，真的画出来了！”

除了社区工作，我也积极参与政协调研。有次参加“推门听课”活动，我特意选了美术课，看到班上的孩子们几人共用一套颜料，有些画笔都快磨秃了，心里不是滋味。课后跟老师聊，才知道学校经费紧张，美育资源跟不上。我把这事记下来，随后在区政协会议上提出《加大中小学美育资源投入的建议》，附上了相关照片和数据。没过多久，相关部门就回复说会逐步增加经费、更新器材。后来再去学校回访，看到孩子们拿着新画笔开心画画的样子，我比自己的画获奖还高兴。

履职这些年来，我最深切的体会是：政协委员不是头衔，是责任。我虽只是一个画画的，但能用手艺为百姓做点事，传递群众声音，让非遗文化活下去、传下去，便不负这份信任。未来，我仍会守着叶画、扛着责任，多走、多听、多做，脚踏实地，不负己心，不负百姓期待。

母亲的酸梅汤，熬出的奋斗与传承

◇ 曾 黎（口述） 熊一雄（整理）

人物名片：彭巧兰，仙桃人，武汉市金汇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创始人；曾黎，武汉市金汇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汉南区政协委员、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非公新生代协会副会长、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园商会副会长。

很多人喝过我们金汇泉的酸梅汤，但可能并不认识我们。我就是那个从小闻着酸梅汤香气长大的曾黎，现任公司的总经理。我母亲彭巧兰，就是那个在三十年前，放弃“铁饭碗”支起大锅熬膏的“倔强”女人。

我的人生和事业，就像这酸梅汤一样，是在母亲日复一日的“熬煮”中慢慢成型的——熬的是真材实料，煮的是匠心传承，更融进了她从台前到幕后、我从接棒到奔跑的酸甜岁月。这碗汤里，有母亲的青春，也有我的使命。今天，我想聊聊这碗汤背后的故事。

一碗酸梅汤，熬出创业路

在武汉，酸梅汤属于有历史渊源的产品。母亲儿时在家里喝酸梅汤，觉得味道很不错，询问家中老人后得知彭氏家族祖上有一个酸梅膏的老方子，一代代口耳相传地留存至今。母亲对此很感兴趣，念书时便选择了食品饮料专业，毕业后在武汉市硚口华中保健食品厂工作，一干就是13年，跟着师傅把酸梅膏熬制的门道摸得烂熟，后来从技术岗转到财务岗，工作稳定却总说“少点劲儿”。

她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天生爱跑爱聊，喜欢跟人打交道谈生意，整天坐在办公室算账、整理报表，总念叨“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30年前，她在办公室反复琢磨“人生短暂，不能在清闲里浪费时光”，最终跳出“铁饭碗”。现在回想起来，我特别佩服

母亲当年的勇气，多少人求稳求安，她却能放下旁人眼里的“好日子”，跟着心里的念头闯，这份“不将就”的决断力，在我工作后才慢慢懂得有多难得。

创业的难，远比她当初想的更具体。没设备、没厂房、没帮手，连熬汤的大锅都得临时找，她把最初那十年戏称为“打游击”。租汉口宝丰路飞翔饮料厂的小车间当临时作坊，白天背着样品出去推销、送货，晚上回来接着熬酸梅膏。

那时候熬膏的锅特别高，得爬台阶才能往上加原料，一包糖就有100斤重，她一个女人根本搬不动，只能跟门房值班的小伙子商量，需要上料时请他来帮忙，一天给20块钱，终于把这事儿解决了；有时送货赶不上公交，就骑着自行车满城跑，夏天太阳晒得皮肤疼，冬天寒风往脖子里灌。每每听到这些，我都忍不住鼻子发酸，可她总是轻描淡写，好像那些辛苦都不算什么。

1995年前后，冰袋在武汉流行起来，很快从城市蔓延到农村，母亲瞅准机会花27000块钱买设备做袋装酸梅汤，一上市就大受欢迎；后来又借铁路局汉阳枕木厂的锅炉熬膏省成本。2000年合伙建厂却因理念不合散伙，2003年咬着牙单干成立武汉市金汇泉食品饮料厂，那天她站在空荡荡的厂房里，说一定要把酸梅汤事业做起来！

2021年公司二十一周年庆典，看着舞狮表演，母亲感慨“多亏了不离不弃的战友”，我在旁边看着她眼里的光，突然觉得特别踏实：她从来不是只顾自己的人，总把一起拼的人当家人，这份情义，其实比生意上的技巧更能打动人。

武汉的酸梅膏制作圈有一段时间鱼龙



公司总部

混杂。因为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没什么门槛，大约有五六十家企业在熬酸梅膏，我们自己喜欢开玩笑说“是个人就可以熬酸梅膏”。后来，国家对这个行业开始要求QS准入，而办许可证需要有专业设备，这样就淘汰了一些小作坊，那时武汉的市场上就只剩下三四家，到现在也就只剩下两三家了。

从白手起家发展到今天，金汇泉达到30亿元的年产值，员工有一百多名。经营面积有近40亩地，在汉南区美国都市工业园还有3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公司在山东临沂承包了2000亩果园，作为原材料种植基地，既控制成本，也便于把控原材料品质。

一份坚守，传承“根”与“魂”

2012年12月我出任公司总经理，开始全面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在酸梅膏、酸梅汤领域金汇泉可能并不是最响亮的品牌，可能也很少在商超货架上看到金汇泉的产品，但是大多数武汉人一定喝过我们的酸梅汤。毫不夸张的说至少有30%的中国人喝过金汇泉的产品，因为我们的产品覆盖了全国的数万家餐饮店。

公司还成功地和“盒马鲜生”达成合作，消费者可以在全国各地的“盒马鲜生”里购买到我们的产品。以前金汇泉一直是B端客户背后的“无名英雄”，消费者在某家火锅店、某间小餐馆喝到了一杯很好喝的现场冲调的酸梅汤，酸梅汤的外包装上没有任何公司品牌标识，其实这杯酸梅汤就是金汇泉的产品。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让公司从幕后走到台前，要让消费者看到金汇泉的品牌。

金汇泉创立至今，核心竞争力就是产品质量过硬。母亲常跟员工说“做食品就是做良心”，这话她也跟我念叨了无数遍。我们一直采用真材实料和独特的熬煮工艺，山楂要沂蒙山区的有机果，乌梅得是福建的，桂花选咸宁的，哪怕成本高也绝不让步。公司的熬煮设备和萃取设备也都是最先进的。我妈做食品，做的是“笨功夫”，也是“真良心”。她不是不懂控制成本，而是认定“喝进肚子里的东西，半点假都不能有”。这份对产品质量的敬畏，不是说说而已，是她几十年如一日盯着原料、盯着生产线的坚持，这也是金汇泉最该传承的“根”。

2019年我和母亲带着产品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世界顶级美味大赛，拿了最

高等级的“3星奖章”，此奖被誉为美食界的“奥斯卡奖”，后来还连续获奖成了中国内地唯一获此荣誉的饮料企业。我们非常自豪，原来我们坚守的“民俗味道”，从来都不输给任何国际大牌。

获得这个奖项的肯定之后，公司当年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已经在美洲、非洲、亚洲布局了销售网络，并培养了一批稳定的客户。

一场变局，开拓多元化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母亲和我盘点了公司的资金情况，做好了即使公司没有营业收入也要给员工发一年工资的准备。母亲曾说：“这些员工和我们共同工作了很多年。按目前情况，我应该可以养他们一年；时间再久一点，可能我们自己也撑不下去，但我们已经尽力了。”好在政府十分迅速地将疫情控制住，让公司挺过了难关。

这次经历让我们更加确定企业要多元化发展。根据市场变化，我们及时更新生产线，追求产品种类多元化，从纵向、横向等多个维度发力。纵向聚焦在品类上，除原有的酸梅膏和酸梅汤外，还延展出不同口味，比如做低糖的、无糖的酸梅汤，做酸梅味气泡水。横向聚焦在熬煮工艺上，熬煮工艺除了做酸梅汤，还做山楂汤和小吊梨汤。

现在的年轻人一般懒得动手，很少主动购买需要冲调后才能喝的饮料。父母辈买了酸梅膏，冲好了酸梅汤，放进冰箱后年轻人肯定会拿来喝，但他们不会主动去买，酸梅膏的绝大部分客户是中老年人。我认为酸梅膏一直会有消费者，但



曾黎和妈妈在布鲁塞尔的获奖现场

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小，那么公司产品肯定要改变，要适应年轻一代消费者的需求。

2020年公司新上了气泡水生产线，把酸梅汤延展成酸梅气泡水，生产年轻化的迭代产品，在武汉酸梅行业里最先做出此类创新。2021年又推出了健康概念的无添加系列，老人、小孩都可以喝。酸梅膏的传统制作工艺中必须加一些添加剂，要做到无添加有一定的技术困难，我们的研发团队正在努力攻关。

同时，公司的销售模式也朝着多元化发展的目标进行。公司多年来的销售模式一直是B2B，也就是Business-to-Business，对接销售终端，没有直接面对消费者。新冠肺炎疫情后，我们积极探索，尝试销售模式转型，直击细分市场，在B2B的基础上尝试B2SB或者B2C，即Business-to-Small Business和Business-to-Customer，扩展社区团购业务，在抖音等网络平台上开通官方带货直播，直接面对小型商业终端和消费者市场。很多人认为公司发展要提倡聚焦，避免“摊大饼”，但我觉得必须找到两者间的平衡点，不能贪多求大，也不能完全依赖于某一个销售渠道或某一个拳头产品，万一遇到不可抗力因素，对企业将是毁灭性打击。

我还从迪士尼系列品牌中得到启示，文化旅游最吸引年轻人，也能促进多行业协调发展。所以在一楼建设了金汇泉企业文化博物馆，宣传汉方酸梅膏的发展历史。

业内也有同行问过，我是公司新一代经营者，是不是我接任总经理后才有了这些新的发展思路？其实不是。母亲是食品饮料专业的技术专家，擅长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这是她的优势；作为年轻一代，我可能更善于把握市场机遇，阅读分析行业报告，研究目标消费人群，这是我的优势。我和



金汇泉的酸梅汤和酸梅膏

母亲有时候也会争论，但没有理念不合的问题，母亲学习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挺强，有时我们的碰撞反而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母亲今年63岁，她还亲自当研发总负责人，跑国内外展会、一家家谈商超合作，终于敲开山姆的大门，线上回购率也很高。我常说她“不服老”，其实哪是不服老，是她对这份事业的热爱，从来没随着年纪减少。这份热忱，一直感染着我，让我知道做事不能急功近利，得沉下心来。

现在母亲也快退休了，每天早上她还是习惯去车间转一圈，闻闻酸梅汤的香气。我最敬佩的不只是她把小作坊做成了现代化企业，更是她一辈子没丢的“初心”——不贪多、不糊弄，只想着把健康饮品带给更多人，把武汉的味道传得更远。她的微信签名是“酸梅汤，为梦而生”，这个梦她追了一辈子，如今接力棒交到了我手中，我将继续努力，致力于将酸梅汤做成中国的“可口可乐”。

名流荟萃：抗战名人故居

——武汉抗战遗迹巡礼之三

◇ 邓正兵 王 钢

1938年10月10日，武汉保卫战进入最激烈的关头，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深情地说：

“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

作为全国的抗战中心，武汉政要云集，名流荟萃。国民党要人、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及各部部长如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于右任、李宗仁、徐永昌、白崇禧、孔祥熙、张群、王世杰、王宠惠、陈立夫、朱家骅、孙科、何应钦、何健、张治中、邵力子、熊式辉、周佛海等来到武汉。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也迁到武汉，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如周恩来、董必武、王明、秦邦宪、吴玉章、叶剑英等人来到武汉，朱德、彭德怀、项英等八路军、新四军将领也来往于武汉。第三党的章伯钧、彭泽湘，救国会系统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张申府、王造时、黄炎培、

杜重远、沙千里，妇女界领袖沈兹九、曹孟君、刘清扬，文化界名人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洪深、冼星海、张曙等云集武汉，从事抗战工作。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诺尔曼·白求恩、柯棣华、伊文思、罗伯特·卡帕、博斯哈德、卡尔逊、鹿地亘、绿川英子等国际友人也来到武汉，支援中国抗战。

在历史的长河中，抗战名人故居每一处都有独特的故事，都是武汉抗战的鲜活见证。

周恩来故居：珞珈山上运筹帷幄

周恩来故居，位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南坡“十八栋”教授别墅群19栋27号，为一栋坐北朝南的西式三层楼房，古朴雅致。1938年5月至9月，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在此居住。1983年，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2001年，



1938年夏，周恩来、邓颖超在珞珈山寓所前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

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2018年，列为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37年12月，周恩来从延安抵达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及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主要负责军事和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在珞珈山居住时，周恩来会见国民党高级将领，共商抗日大计；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和新闻界名人，会见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同时领导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从而团结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

郭沫若旧居：一代文豪抗战印记

郭沫若旧居，位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南坡“十八栋”教授别墅群第12栋20号。1938年4月至8月，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在此居住。1961年，郭沫若夫妇曾故地重游。郭

沫若旧居内陈列许多历史文物和图文资料，展现了郭沫若的工作、生活和创作历程。200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1938年4月1日，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凭借在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组织吸收田汉、阳翰笙、冼星海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进入第三厅工作，使之变成人才济济的“名流内阁”。在汉期间，郭沫若发表大型公开演讲20次，发表作品40余篇。在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九一八”七周年扩大宣传周、“七七”抗战周年献金等宣传和纪念活动有声有色，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有力支援了前线。



1963年11月，郭沫若（右四）、于立群等在珞珈山寓所留影

冯玉祥故居：“文协”理事客厅聚会

冯玉祥故居，坐落在武昌区千家街8号大院内，青砖红瓦，两层砖木结构西式洋房，



武昌千家街冯玉祥故居今貌

建成于1926年，为基督教英国循道会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堂区的教牧人员住宅楼。冯玉祥信仰基督教，人称“基督将军”。1937年11月至1938年8月，冯玉祥作为基督教循道会的著名教友，受邀来此居住。

1938年2月，周恩来和王明看望冯玉祥，周恩来阐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冯玉祥深表赞同，从此与中共保持了密切联系。“文协”成立后由于没有会址，冯玉祥提供寓所的客厅供理事会开会。同住此处的还有老舍、楼适夷等文化名人及李烈钧、鹿钟麟等军政要人，一起共商国是，积极宣传抗战。周恩来对冯玉祥将军评价道：“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石瑛旧居：“民国怪杰”支持抗战

石瑛旧居，位于武昌区昙华林三义村23号。石瑛是辛亥革命元老，历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湖北省建设厅长、浙江省建设厅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因从政清廉，处世刚正，素有“民国第一清官”“民国怪杰”之称。1928年，石瑛在此购地建房。1929

年至1930年、1937年至1938年居住于此，接待过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张难先、严立三、陶铸等人来访。2008年，石瑛旧居列为湖北省文保单位。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到此，与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农村合作事业委员

主任石瑛协商，以建设厅的名义在应城汤池开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简称汤池训练班），借培训“合作指导员”之名，培养了一批抗日干部，建立和发展鄂中党组织。与此同时，石瑛筹划组织武汉工厂设备和湖北省政府西迁，根据战时需要发动民众抢修公路，有力配合了抗战军事行动，保障了湖北军民物资补给。

鲁兹故居：国际友人联络聚集

在江岸区鄱阳街32号，一座西式风格两层建筑静静伫立。1904年至1938年，美国主教鲁兹（中文名吴德施）全家在此居住。



鲁兹故居

鲁兹故居（史沫特莱旧居）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友人的重要聚集之处，更是一座跨越世纪、维系国际友谊的桥梁与纽带，见证着国际友人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1988年，列为武汉市文保单位。1992年，列为湖北省文保单位。

国际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诺尔曼·白求恩、伊文思、罗伯特·卡帕、博斯哈德、卡尔逊上校等到汉后，都在鲁兹家中居住，路易·艾黎、爱泼斯坦也在此留下活动足迹。其中，史沫特莱居住长达10月之久，故此处也称为史沫特莱旧居。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分享情报，共同为中国抗战出谋划策。在纷飞的战火中，鲁兹主教的家成为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关键联络站。

鲁兹是一位开明的、具有民主思想和正义感的宗教神职人员，他积极支持共产党人在武汉的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4月19日，鲁兹告老回国前夕，周恩来亲笔题词相赠：“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吴主教在华四十年的最后宝获。嚶嚶其鸣，以求友声——这是我们希望吴主教带回国去的福音。”字里行间，满是对鲁兹的尊重与期许。

昙华林：抗战文化闪耀光芒

昙华林，位于武昌区老城的东北角，坐落在花园山北侧和螃蟹岬地带之间，全长约1200米，面积约1平方公里。昙华林是武汉一处声名遐迩的历史文化街区，踏入那蜿蜒曲折的小巷，仿佛瞬间穿越时空，石瑛旧居、徐源泉公馆、政治部第三厅旧址等老建筑，就像一个个沉默的历史见证者，静静伫立在巷边，向游客诉说往昔的故事。

1938年，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



昙华林石瑛故居今貌

昙华林迎来了田汉、洪深、冼星海、张曙等人。一时间，众多文化名人云集于此，他们用自己的才情和热血，在昙华林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抗战之歌，在抗战烽火中绽放出文化光芒。

昙华林，2020年确定为第一批湖北省历史文化街区，2021年入选湖北省旅游休闲街区，2023年评为第三批省级特色商业街。每当人们漫步在昙华林街头，仿佛还能听到当年慷慨激昂的歌声和振奋人心的呐喊，那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民族精神的传承。

邓正兵，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王钢，武汉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

鹰击长空（下）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十

◇ 涂文学

东瀛远征

为争取战争主动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1938 年 3 月制定《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以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等重工业城市为主要轰炸目标，为此成立了特别轰炸机队。

5 月 19 日，中国空军出动 2 架马丁 B-10 式飞机，在第 14 队队长徐焕升带领下，15 时 23 分从汉口起飞，23 时 48 分在宁波栎社机场加油后继续东行，20 日凌晨到达日本，在熊本、长崎、福岡、佐世保等城市散发传单数十万份，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警告日本军阀切勿执迷不悟自寻灭亡，呼吁日本人民反对战争珍爱和平，10 时左右凯旋。

记者采访了队长徐焕升和飞行员吴积冲等人，在《中国的空军》第 11 期刊载《人

道的远征日本（空战座谈会）1938 年 5 月 21 日下午》（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 年，P263—264）一文，节选如下：

“我们出发将有一刻钟的时间，便发现在我国的海岸有敌舰 5 艘，灯光明亮，并曾用探照灯向空中四射，但并无其他动静，大概是一种普通的警戒，未必发现到我们。”

“我们在 20 日上午 1 时 × × 分到达日本上空，下面可以看到位置在九州岛上的一个城市（大概是熊本市），这时敌人好像并没发觉，城市中的电灯光，仍旧明白可见。于是，数万张的警告文字，如雪片般散落下去。”

当记者问及他们当时有何感想时，徐焕升说：“我们没有什么感想，高临在这个灯光闪灿的敌人的城市上，我们十分兴奋，大家紧张的工作着，把传单从机下的洞中抛掷下去，哪里还有什么感想的裕余呢？我们只



徐焕升队长远征归来

觉得我们正在做着有益于人类文化的事业，完成历史的一页，而对着这完全被我机控制的灯火辉煌的敌国城市，十分叹息他们人民为军阀所愚弄所压迫。你们想，倘若我们掷下的不是10万传单而是万磅炸弹，那么在我们铁翼下的敌国城市将成何等惨酷的情形呢？”

“我们这次的航程，依着地图的推断，是从岛原海的附近登陆，穿过熊本市，向北作半圆形，经过久留米、福冈市、佐世保的上空，到达长崎港。当我机从灯光明亮的第一城市前进，而到第二、第三……城市时，那些城市都已漆黑如死市了，大概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飞机，整个三岛实施灯火管制的缘故。”

当记者问徐焕升在日本上空呆了多长时间时，他说：“一点钟的样子，我们从熊本，到久留米，到佐世保，到长崎，把我们带去的200万传单丢完了，这才从容而返。……敌人的空防太差了，既没有高射炮，又没有敌机迎战，宛如入了死城一般，使我们十分扫兴。想不到号称远东强国的日本，他们的国土内这样死气沉沉”。

“我们抱着愉快的心情，开足马力向祖国的领空飞返，抵达祖国的海岸时，已经是晨光曦微了。”

中国空军远征日本，遍撒传单，震惊了日本朝野上下，让一向骄横的日本军阀颜面尽失。消息传开，国人兴奋异常，远征健儿凯旋之际，军政要员亲临汉口机场迎接，武汉各界集会庆祝，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吴玉章、边章五、罗炳辉等代表八路军，赠送了两面锦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气吞三岛，威震九州”，给予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

“5·31”空战

1938年5月31日，日海军航空队以驱逐机36架、重轰炸机18架，分别由江西、安徽溯江而上，再次进犯武汉。“分二个编队群——驱逐队群与轰炸队群，先后于不同的地点起飞，战略开进于英山上空，然后以驱逐队群遂行空中战斗，图击溃我驱逐队，至少也要将我主力抑留一边；让轰炸队遂行主要的任务，将翼下挂着万磅以上的炸弹，抛向大武汉”。

中国空军以两个编队机群迎战，“即是控置一个编队群在5000英尺的空中，作为战斗的主力部队；另控置一个编队群在8000英尺的高空，掩护主力作战。就这样一个3000英尺的立方纵深的铁的阵营，运动在武汉空中警戒内圈的东南半径上空，准备给强行进的敌军，以阵前逆袭”。（《大武汉英勇之晴空如铁——武汉第三次空战大捷记（1938年5月31日）》，《中国的空军》第12期，转见同上，P266—267）。

中午12时许，日机飞临武汉警戒空域，中苏战机共49架迎战，“我各机侦明敌机



徐焕升队长（右）、佟彦博僚机机长（中）、蒋纯禹分队长（左）

企图，急取包围形势，向其四周压迫。敌轰炸机见我有备，纷纷掉头东逃，未敢进入市区投弹。当其驱逐机掩护轰炸机退却时，我某队立予猛扑，寻求死角格杀。敌机在我射程内控制下，上下翻腾，期求脱避，我机紧逼格杀，毫不放松，是时尔沉我升，格斗机声，震撼全市”。

空战进行30分钟左右，共击落敌机14架，其中在武汉空域击落12架，在江西湖口空域由苏联志愿队击落2架。中央社报道说，“我机奋勇向前，先将敌机队形冲散，然后集中火力，将敌各个包围攻击，计先后被我击落敌机达十二架之多。敌机见势不佳，纷纷开足马力，向东逃窜，我机跟踪追击敌[至]黄冈附近而止。另一批敌水上机，轰炸我马当一带，我某处飞机闻讯疾驶拦截，当击落敌机两架，一落于湖口附近，一落于湖口对岸之沙洲上”。（《中央社讯：击落敌机经过，1938年6月1日》，转见武汉市档案馆等编：《保卫大武汉——纪念武汉抗战六十周年专辑》）。

“5·31”空战是继“2·18”“4·29”空战后，发生在武汉上空的第三次大空战。中苏空军密切配合，在三个不同层次高度构成立体纵深空战，对日机形成合围之势，并从高处俯冲敌机，从而取得两次大捷后的又一次胜利。

“8·3”空战

“8·3”空战是武汉会战中的最后一次空战。8月3日上午9时，日海军第12、13、15航空队从安庆机场出动战斗机共29架、攻击机18架（一说驱逐机50余架，轰炸机18架），意图空袭汉口机场和汉阳兵工厂。“10点半钟，编队飞行的大批敌机由襄河长江毗连处上空进入我汉口飞行场航线，嗡嗡的重轰炸机声沉闷的带来日本军阀蛮横臭气。在高射炮阵地指挥的吴连长用他的望远镜紧张地向晴朗天空搜索敌机，在极高极远的天边，是9架微小的灰白点子编队的机场前进。一会儿，在9架后边又跟进9架，这些都是敌人重轰炸机，在后面，更高空还有10架轻俏[俏]的九六式驱逐机在做着掩护。到机场上空，这些远道来客马上撒下带来的炸弹。（朱民威：《武汉空战（1938年8月3日）》，汉口《大公报》1938年8月4日）。据日本战史记载，炸毁汉口机场地面飞机7架。

中国空军第3、4、5大队和苏联志愿队共52架飞机分4个机群迎战，在武昌南郊和黄石港上空激战。在武昌洪山宝塔附近上空，中国空军两个大队的战机与敌40余架驱逐机激战，先后击落8架。在汉口北部，空军勇士“放掉敌轰炸机群来去和其驱逐机格斗。很快的□□大队长与许宝君二人各控制敌机一架在手，一顿机枪狂射，都成了狂

坠的尾旋状态栽下去。剩余的见不是对手，慌忙逃遁。被我机追到黄石港附近，由小苍鹰的神速机赶上追击，敌重轰炸机一架被击命中，起火坠下”。（朱民威：《武汉空战（1938年8月3日）》，汉口《大公报》1938年8月4日）。

据中国方面战报，“8·3”空战战绩显著，共击落日机12架（一说14架），俘获日军飞行员6人，日飞行员新直久等人战歿。中苏空军也付出沉重代价，损失战机7架，中国飞行员狄曾益和苏联飞行员菲利波夫、古罗夫牺牲。

另据中央社报道，8月3日，中国空军袭击日军安庆机场和停泊在江面的日海军舰艇取得战果。“昨日（即8月3日）晨，我精锐机口口架，飞经安庆轰炸飞机场及停泊在江面之敌舰，成果极佳。当我机飞至目标上空时，发现机场中停有大批敌机，即瞄准投下多数重磅炸弹，敌机均未起飞，炸毁者甚多。同时在江面发现敌大型舰十二艘，亦即饷以巨弹，有一艘中弹炸伤甚重。当我机投弹完毕后，突有敌机九六式驱逐机十九架追来，向我攻击，我机立即展开阵容，将敌机九六式痛击，结果连续击落敌机两架，均于空中起火焚毁；其余之敌机逐渐不支，纷纷四散逃窜。我机于任务达成后，全部安返原防。当空战时，我机之射击员一名足部曾中二弹，但仍能奋勇杀敌，卒将敌机两架击落。又我机之另一驾驶员，于发动机中弹后，仍能沉着操纵，与其余各机安返原防，及足见我空军作战之勇敢及技术之高超”（中央社讯：《“八·三”空战纪实 1938年8月4日》，转见同上，P195）。

“8·3”空战后，中国空军主力逐渐向



苏联志愿队飞行员准备起飞

西转移到衡阳等地，没有足够力量应对来袭日机。虽有8月12日苏联志愿队40架战机与日军70架战机的激烈战斗，但总体上再无大规模空战，中国空军在武汉地区的制空权完全丧失。

苏联志愿队及南昌空战

如前所述，武汉会战前夕，中国空军飞机只剩下81架。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派遣军事专家和航空志愿队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从苏联购买的飞机，至1938年2月已达232架，其中战斗机156架、轻轰炸机62架、重轰炸机6架、教练机8架。加上原有飞机共拥有390架，其中战斗机230架、轰炸机160架。

1937年10月，从苏联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航线通航，下旬第一批苏联志愿队254人来华，分别组成以基达斯基领导的轰炸机大队和库尔丘莫夫为首的战斗机大队。库尔丘莫夫在途经凉州时因飞机失事殉职，改由普罗科菲耶夫接任。此后，苏联志愿队不断扩充，高峰时达到战斗机队和轰炸机



曾任苏联志愿队负责人的波雷宁空军上将

队各4个大队。到1941年，共有2000多名飞行员先后来华作战，历任负责人有日加列夫、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波雷宁等，具体编组情况是：驱逐机第1大队：飞行员60人，机械员100人，伊15驱逐机40架。驱逐机第2大队：飞行员60人，机械员100人，伊16驱逐机40架。轻轰炸机第1大队：飞行员60人，轰炸员40人，通信员40人，机械员30人，仪表员3人，斯伯-2轻型轰炸机20架。轻轰炸机第2大队：飞行员60人，轰炸员40人，通信员40人，机械员30人，仪表员3人，斯伯-3轻型轰炸机20架。重轰炸机大队：飞行员16人，轰炸员6人，通信员6人，机械员20人，德伯-3远程轰炸机4架。

苏联志愿队几乎参加了武汉会战中的所有空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轰炸台北松山机场时，苏联志愿队从31架高速轰炸机中抽出12架，由波雷宁上校指挥。当接近目标时，发现目标被云层遮住，飞机高度5500米，其时还没有能在昼夜和任何天气情况下对目标进行准确轰炸的设备。机群散开队形，瞄准停机坪、机库、港口设施和港口军事运输停泊场进行密集轰炸，又用机枪

扫射未炸中的飞机和高射火力点，安全返回基地，充分展示了苏联飞行员的精湛技术和英勇果敢。

“5·31”空战中，苏联歼击机飞行员安东·古边科，在击落一架日机后弹药耗尽，毅然猛地撞向迎面来的一架日机，最后居然成功驾机安全降落。他凭借在中国战场击落7架日机的战果，获得苏联政府“红旗”勋章。

苏联志愿队在武汉会战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南昌空战之中。1938年3月，为配合陆军作战，中国空军在南昌设立第1路司令部，协同第3、5战区作战。南昌机场在武汉会战中的战略地位凸显，主要由苏联志愿队使用，战斗机大队由布拉戈维申斯基指挥，轰炸机大队由科兹洛夫指挥。在南昌机场上空，主要有“2·25”“6·26”“7·4”和“7·18”空战等。

1938年2月25日，日海军木更津和鹿屋航空队攻击机35架，在第12、13航空队18架战斗机掩护下袭击南昌机场。中苏共50架战斗机分3个机群迎战，敌我双方各有1架战机被击落。日方吹嘘夸大战果，称击落中国战机共42架，自损只有2架。

6月26日，日海军第12、13航空队以及陆军航空队独立飞行第4中队共50架飞机轰炸南昌新旧机场，中苏28架战机迎战，击落日机6架，自损2架，苏联飞行员施图尔敏牺牲。

7月4日，日海军第12、13航空队攻击机和战斗机共50架轰炸南昌机场，中苏空军共65架战机拦截交战。关于空战结果，中日双方各执一词极为悬殊。日方称击毁中方40架，另击伤地面9架，自身10架不同程度受损。中方则称击落日方7架，自损7架。

7月18日，日海军第15航空队轰炸机

14架（一说34架）、攻击机5架、战斗机6架（一说18架）袭击南昌新旧机场，还以4架轰炸机降落到机场地面，轰炸、扫射、焚烧所停飞机。中苏空军15架战机迎战，空战异常激烈，日战斗机编队指挥官、号称日海军航空兵“四大天王”之首的“空中霸王”南乡茂章大尉，被苏联飞行员多多诺夫击毙。为解救苏联志愿队总领队巴比洛夫，中国飞行员黄莺单机冲入日机群而英勇牺牲。这次空战，击落日机4架，自损3架，机场地面12架被烧毁。

武汉会战中，苏联志愿队究竟击落了多少架日军飞机、炸毁了多少日方军事目标、自损状况如何，无论民国还是苏联都缺乏确切记载。据1938年至1939年曾任国军军事顾问的卡利亚金在其《沿着陌生的道路》书中回忆，武汉会战中，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共拥有作战飞机602架，到会战结束时仅存281架，损失高达321架，而日本方面损失72架，双方损失比接近5:1。中苏空军虽然取得“2·18”“4·29”“5·31”空战及轰炸台北松山机场大捷，但客观言之，由于日空军力量强大拥有绝对制空权，还是中方处于下风，损失远远大于日本。

据统计，中国空军飞机被击落166架、炸毁46架，着落时操作失误损毁100余架，反映出飞行技术和职业素养都很差。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统帅部门对于空军并不十分满意，在“4·29”空战后撤销了空军前敌指挥部，并将空军司令周至柔改任昆明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以钱大钧任航空委员会主任。

苏联志愿队在武汉会战中英勇作战，有15位队员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他们是：瓦连金·谢尔盖耶维奇·考兹诺夫（1938年2月15日牺牲）、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别索茨基（1938

年2月15日牺牲）、乌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巴拉莫诺夫（1938年2月15日牺牲）、莫伊塞·伊莎阿科维奇·基吉里什登（1938年2月15日牺牲）、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师什洛夫（1938年2月8日牺牲）、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马特维耶夫（1938年7月16日牺牲）、伊凡·伊里奇·斯图卡洛夫（1938年7月16日牺牲）、德米特里·费奥法诺维奇·库列申（1938年8月21日牺牲）、马尔克·尼古拉耶维奇·马尔琴科夫（1938年7月9日牺牲）、马拉基米尔·格拉西莫维奇·多尔戈夫（1938年7月16日牺牲）、列昂尼德·伊凡诺维奇·斯柯尔尼亚科夫（1938年8月17日牺牲）、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古里耶（1938年8月12日牺牲）、柯西扬·柯西扬诺维奇·楚里亚科夫（1938年8月12日牺牲）、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泰列霍夫（1938年8月12日牺牲）、伊凡·尼科诺罗维奇·古罗夫（1938年8月3日牺牲）。15名烈士中，年龄最大的33岁，最小者仅24岁。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苏联空军勇士。1956年，将万国公墓中的15位苏军烈士遗骸，迁至武汉解放公园安葬。花岗岩墓壁正中镶嵌烈士姓名，墓冢左右各置中俄文刻的记事碑，墓前广场矗立大理石纪念碑。纪念碑为方锥形，正面刻“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碑”，背面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碑座四面为中苏两国国徽浮雕。2019年10月，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列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加拿大护士尤恩的“抗战三镇行”

◇ 王汗吾

加拿大著名医生、共产党员白求恩为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奔赴前线救治抗战军人，不幸牺牲在中国。毛泽东主席在追悼会上致辞《纪念白求恩》，给予崇高评价，也使亿万中国人记住了白求恩。

与白求恩同船来中国投身抗战的，还有一位白求恩的故乡人——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Jean Ewen，1911-1987）。翻开

她 1981 年出版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黄诚、何兰译，时事出版社，1984 年），可以知道作者虽已高龄，但对在中国的经历记忆犹新。特别可贵的是，她曾多次来武汉，在三镇都留下了足迹。

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的女儿

1919 年，尤恩六、七岁时，母亲患病去世。父亲是个贫苦工人，20 年代初期读到马克思主义书籍，后来成为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1931 年底因“煽动罪”被捕监禁。尤恩说，“势所必然，我们成了无所依靠、自食其力的小家伙”。

到十五六岁时，尤恩离开学校，“在一间洗衣店工作，后来在北温尼伯的圣约瑟夫医院学护理”。护理生活的困苦磨砺，练就了她开朗的性格、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健壮的



琼·尤恩和她的回忆录

身体。王安娜（外交家王炳南的妻子，德国人）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这样说：“我曾听到许多人说她不错，有的人称赞她‘能吃苦’，这是中国人给外国人最高级的赞词。实际上，不管条件怎样

困难，她都是笑容满面，保持爽朗、乐观的态度。”

1933年3月，尤恩幸运的找到一份工作——以教士的名义到中国当护士。她到了山东的一些城镇，在教会开办的诊所工作。她勤奋地自学汉语，不久就能操着流利的山东话，在集市上与小商贩讨价还价。在热心为病人治疗的生涯中，她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有了一个中国名字——于青莲。

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尤恩遇上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她回忆说，在济南一次沿着城墙散步，当时有好几百学生正在操练，他们雄壮的脚步声和口号声震撼着古老的城墙。一个青年学生冲到我的跟前，挥着拳头冲着我喊“洋鬼子滚回去！”我告诉他，“我不要回去。我要参加红军。”那时真没想到在一年多以后，我在延安又碰上了这位年轻人。

飞抵武昌坐轮渡到汉口

1937年6月，尤恩回到加拿大，可是转瞬中国爆发了全面抗战。她读到了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描述中国人民受到轰炸的恐怖景象和他们所受到的极端不幸与痛苦”



汉口美国圣公会主教府



信义公所

的文章，又看到史沫特莱的油印信——呼吁医生和护士去中国。这时，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成了“援华委员会”，尤恩立即前去纽约取得了联系。此后，她毅然辞掉薪金优厚的工作，参加以白求恩为首的医疗队，作为白求恩的翻译再次远涉重洋，重新踏上中国土地。

1938年1月底，经过漫长的海上旅行，白求恩、尤恩一行终于到达香港，很快飞往硝烟弥漫的武汉。“两个多小时后，飞机在长江南岸的武昌简易机场降落了。飞机一着陆，地勤人员马上就用伪装网把飞机伪装起来。”这个机场显然是武昌南湖机场，史沫特来迎接白求恩、尤恩一行，安排他们分乘小汽车和黄包车赶到武昌江边，乘轮渡到汉口。

尤恩写道：“当天的天气很冷，寒风刺骨，但我们高高兴兴到达了目的地。这是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公馆。那儿聚集了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人，但并不是全都信奉英国国教，有作家、医生、使馆官员、飞行员、教师和传教士等等。我们受到了主教的热情款待。主教年高德劭，为人明智。他的圣公会教堂被人称作‘延安’，因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去那儿喝茶和讨论有兴趣的重大时事问题。”

尤恩提到的“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公馆”，其实是美国圣公会在汉口的主教洛根·赫伯特·鲁兹（Logan Herbert Roots，汉名吴德施，1870—1945年）的主教府，在今鄱阳街北京路口。武汉作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中外人士频繁造访主教府，特别是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经常来往，朱德、彭德怀也曾拜访，因此主教府被外国人称为汉口的“延安”。

尤恩写道：“到达汉口的当晚，史沫特莱、两位大夫和我就去住在路德教会内林可胜医学博士的家里。……林大夫问我们是否愿意去八路军那边工作。根据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协议的条文，林大夫有责任派医疗队去共产党统治区。……他手下的大多数医生和护士都怕去特区共产党统治的地方。白大夫说他非常高兴去，甚至说除了特区以外，根本就不想去别的地方。……他转身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去。我回答当然去啦。……后来，周恩来先生走了进来，表示欢迎我们去八路军卫生部工作。”

尤恩说的林可胜博士住的“路德教会”，是洞庭街黎黄陂路口的信义公所，该公所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住宿，特别是教会人士和外国人，相当于过去的各地会馆。

在汉口巴公房子美容室理发

武汉三镇经常受到日军飞机轰炸，尤恩回忆说，“在一次难得的解除警报后，我决定去山西之前理一理发，于是走进开泰街的一家美容室（作者注：俄租界时期今鄱阳街一段称开泰街，是俄语“中国街”之意）。我请理发师把长发剪了，他以为我是发疯哩，因为短发不是当时巴黎的时髦发式嘛。我的男孩式的短发还未理好，该死的警报又

尖叫起来了。理发师是个白俄，他坚决不干了，连哄带劝地把我轻轻推出门外，说等警报解除后再回来。大街上，我发现自己挤在一伙人群中。他们带着行李、家畜和孩子，惊慌失措，一齐朝英国租界涌去。那时日本飞机还不敢炸到英国人头上，所以，租界至少是相对安全的。我飞快地跑回住处，……在楼梯上遇见了史沫特莱，她迎面喊了一声，‘好家伙，你像个傻小子了。’随后，史沫特莱热心而且熟练地把我没理完的头发给理好了。可至今，我还未付钱给那个把我的头发乱剪一气的白俄理发师哩！”

在汉阳教会医院抢救伤病员

在准备去西安转道延安期间，白求恩、尤恩在武汉三镇到处奔波，“拼命地采购外科器械和医疗用品”，还有一个星期是在“汉阳的一所长老会医院”里抢救伤病员：

“我们到达医院，只略作介绍，便开始工作了。候诊室里挤满了上次空袭时受伤的人员，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有些



弗朗西斯·鲁兹（中）慰问八路军（《伦敦新闻画报》）



1972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弗朗西斯·鲁兹

伤员还没有来得及治就断气了。满地都是血污、粪便和呕吐的脏东西。有两个小孩在父母的尸体旁吓得大哭。我们忙于截肢、止血、取出弹片等等。血的气味可不是好闻的，钻进鼻孔便长时间去不掉，吃饭时更感恶心。但当时，我们都顾不得这些了，因为任务紧急，时不待人，耽误了是要死人的。”这个“长老会医院”实际上是高隆庞会的一个小诊所，后来成为武汉市第五医院。

“回到主教的住所，我们才得知主教的漂亮女儿弗朗西丝来到了，这真使我们喜出望外。弗朗西丝率领了一个外国青年代表团去山西南部慰问八路军彭德怀部刚刚回来。”1938年初，弗朗西斯·鲁兹与史沫特莱以及一批欧美人士组成“八路军国际慰问团”，将募集的物资送到八路军总部并对延安进行了采访。

1972年，周恩来总理邀请美国音乐家理查德·哈顿夫妇到中国演出，理查德·哈顿夫人便是弗朗西斯·鲁兹。哈顿夫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演奏了弗朗西斯创作

的《庐山组曲》，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弗朗西斯将其父亲晚年的照片呈送周恩来总理。他们返回美国后，在白宫得到尼克松总统的会见。2024年11月，美国鲁兹家族（含六代孙）寻根之旅又来到汉口，并在主教府留影

一个多月后，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白求恩和尤恩于1938年4月1日辗转到达延安，马上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白求恩去了山西五台山，尤恩则留在陕北、晋绥边区工作。在一二〇师，她与贺龙、肖克

等将领建立了友谊。

10月中旬，由于健康原因，尤恩准备回国，再次来到频繁遭受轰炸、即将沦陷的武汉。

在汉南燕子窝险遭轰炸遇难

武汉沦陷前夕，国民政府组织全面撤退。10月22日，尤恩与王炳南、王安娜在李克农、边章五的带领下，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人员一起乘坐“新升隆”轮船，溯流向重庆转移。轮船上载有近百人，还装有印刷器材，严重超载，速度很慢。

23日上午8时多，轮船上行到距武汉110公里的汉阳县南部燕子窝江面，由于日军飞机常在白天来袭，李克农命轮船停靠在燕子窝码头，大部分人员上岸疏散，龙飞虎带领警卫战士留在船上守卫，一些带小孩的妇女也留在船上。

下午3点半左右，未见日军飞机飞临，岸上人员陆续返回船上。李克农、潘梓年等

准备最后登船，便在岸边茶馆等候。此时，四架敌机从对岸飞临上空。李克农果断指挥岸上人员分散隐蔽，并呼喊船上人员离船。敌机低空盘旋后，为首的投下一颗燃烧弹，在轮船前舱顶棚爆炸燃烧，烈火迅速蔓延。紧接着，敌机又扔下几枚炸弹，还绕着轮船来回盘旋俯冲，用机枪向船岸边的人群扫射。

尤恩说：“我们赶紧跑到河堤的背面隐蔽起来。三架飞机直对着我们飞了过来，在我们头上盘旋了一周，

那架领头的向下俯冲，一下子又向上飞，掀起一阵气流猛然袭来，简直要把人吸走似的。飞机在我们的顶头上空投下一颗燃烧弹，正好炸中了‘红星轮’（作者注：尤恩在回忆录中将“新升隆轮”叫做“红星轮”）”“我从堤边向外偷看一眼，只见我们的船火焰腾腾。马达的响声减弱了，哭喊、尖叫、负伤或垂死的人的呻吟声清晰可闻。日本飞机又转了回来，又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整条船被炸得粉碎。那一声爆炸的巨响震得我发聋，好一阵子什么都听不见。那些飞机又作了个更大的回旋，飞得更高。这时候我们赶忙找个更好的地方藏身，我全身紧紧地贴在地沟里。一架飞机突然俯冲下来开动机关枪。别的飞机也跟着向村庄、水面、船只、鸡犬扫射，连可怜的老水牛、黄牛也不能幸免。一架单翼飞机向我们飞来，那机枪手竟然从驾驶舱探出身来向地面的目标扔手榴弹。日本飞机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在四周扔下大量杀人的东西！有三颗子弹嗖嗖



1939年，尤恩（中）在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与陈毅（左二）、梁裕（右二）、希伯（左一）、史沫特莱（右一）合影

地从我的耳边飞过，把我放在地上的帽子射穿了。突然一阵恐惧感袭向心头，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我想爬起来、想跑开、想呼喊以减轻痛苦。”“忽然，我感到脸和脖子上有点儿湿，我摸了摸自己的脸，上面沾满了血和泥。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受伤了，但定一下神，我很快发现我的皮肉仍然完整。我确信，我的性命得到了神灵保佑。”

“新升隆”被炸沉，造成船上近百人伤亡，其中《新华日报》16位记者编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9位工作人员（一位是武汉新知书店人员钱歧）共25人不幸遇难。

后来，尤恩经广西、越南到香港，再到上海，又去安徽新四军的医院工作一段，最后回国。

王汗吾，武汉地方志专家，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巡视员

中国深山里的教育事业

◇ 骆传芳 骆夏露德 / 撰 付 强 / 译

原文注：这些珍贵的信件从云南省南部的喜洲村被空运至波士顿，讲述了中国的大学如何在通货膨胀、日本轰炸以及缺乏实验室、图书馆甚至纸张的情况下坚持办学的故事。骆传芳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华中大学文学院长及心理学教授。他的妻子骆夏露德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于1937年在上海结婚，随后入职位于武昌的华中大学，参加了该校在抗日战争中的办学。1938年9月学校迁至桂林，日本的轰炸机炸毁了华中大学的建筑物，之后经过多地辗转到了现在的办学地点。

译者注：这篇文章原载于1944年1月美国《Atlantic》杂志。2020年12月，作者骆传芳的儿子骆明德先生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家中将原文扫描件传给译者，并授权翻译发表，文中标题采纳了他的建议。

骆传芳（1903—1969），著名心理学家、英语教育家。籍贯江西九江，出生于武汉。1924年本科毕业于文华大学哲学系，1929年硕士毕业于燕京大学，1935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系哲学博士。1935年5月后，任华中大学心理学教授、外文系教授，总务长兼文学学院院长、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外文系

主任。1953年后，任中山大学西语系教授。

骆夏露德（1910—2006），美国芝加哥人，骆传芳夫人，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37年至1953年，历任华中大学、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外文系教授，主要教授英文戏剧、英文诗选、英文作文等课程。1953年后，任中山大学西语系教授。

1938年9月至1946年4月，华中大学西迁办学期间，骆传芳是学校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46年4月17号，骆传芳带领第一批师生从云南大理喜洲镇出发，回到武昌昙华林华中大学原址。

他的讲述

如今，中国高校教授的困境，就像那些因战争投机者的巨额财富一样，为普通民众所熟悉。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难民生活后，这些曾在中国社会中享有崇高地位的知识精英，被迫接受了一种仅比那些原本贫穷且备受压迫的中国苦力稍好一点的生存方式。与那些习惯于各种艰辛和匮乏的体力劳动者不同，中国的大学教授不得不学会适应日益恶化的环境。对于一个在战前就享有社会威望、经济有保障和求知欲随时可得以满足的人来说，适应这种持续不断的调整要求并不容易。战时中国教授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他的智力财富，而是因为他的物质贫困。

最让人苦恼的，应该是教育基本工具的缺失或匮乏。让流亡教授深感遗憾的是，他不得不缩减教学和科研活动，原因简单而沉重：教育和科研的材料有限，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补充。如此一来，教授工作职责的履行和抱负的实现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书籍稀缺或遥不可及。经费有限，



1935年，骆传芳、骆夏露德在芝加哥大学校园

而纸张价格正变得难以承受，更别提缺乏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验室设施了。

大多数大学教师已经与外部的书香世界脱节。例如，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我连一本书都没有买过，也未能订阅一份期刊。大学里也没有任何新书可供借阅。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教授的思维正在变得陈旧而狭窄，他们能给学生带去的，常常是以往讲义的重复。有时，教授或许不介意为不同班级重复同样的课程，但迟早他会厌倦年年讲着同样的内容。当他悲哀地发现，那些在他看来已经过时的学说，却被学生们虔诚地记在笔记本上，并被奉为主臬时，就更觉得内疚和自责。

同样，试图通过向学生实行严格的学业

标准来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学生连一本与所学专业相关的教科书都没有。市场上和大学中可供使用的专业书籍少之又少。正是这种在自身研究领域无法进行更新和拓展，同时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教育标准，使得当今中国的大学教学成为一种令人沮丧的例行公事。

一般的跨学科文献的获取难度不亚于专业教科书。在我们这所位于云南边陲的大学里，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能收到的报纸至少是三天前的。如果能找到哪怕是一份任何日期的《生活》或《读者文摘》，那真是莫大的幸运。这份杂志会被全校的教职员工广泛地传阅和分享。多亏了美国新闻处和英国大使馆的出版社，通过它们向在华英语公众发布的战争简报，我们得以了解到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

在战时的中国大学中，研究仍然是在进行的，尽管条件只能因陋就简，最基本的参考文献经常都找不到。在我们这样一所迁徙的大学里，唯一拥有的百科全书已经有近60年的历史了。对于物理和化学实验，电力供应是一个问题，哪怕设备和材料的处理也是如此。社会科学家们想要进行任何一种广泛深入的调查，他们都面临着交通运输的困难。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几乎每所中国迁徙大学都在进行一些研究。那些生活拮据的教授并未轻易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可以预见的是，当下对工业化学、物理工程、气象学和战时经济等实践领域的研究需求十分旺盛。中国商务部与教育部合作，为任何成功发明本国工艺以生产战时和工业产品的人提供从85000美元到100000美元不等的奖金。由于中国大学的迁移，它们与苗族、傈僳族、羌族等部落有了密切的接触，语言

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忙于研究这些部落的方言和民间传说。教育部通过颁发杰出作品奖和提供研究资助，为维持他们的科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在学校，由于缺乏足够的实验设备、参考资料和其他常规教学辅助工具，教授难以呈现出高等教育应该有的样子；而在家，他不得不更加吃苦耐劳地做一些家务，以满足更多的家庭生活的需要。他的家庭问题繁多，尽管性质有所不同。首先，他无法再依赖家庭佣人来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在不用忙于教学时，他不得不协助妻子处理购物、烹饪和洗衣或照顾孩子等事务。

因缺乏有益的娱乐活动，家务的枯燥乏味显得尤为突出，尤其是对于家庭中的妻子而言，她与外界的接触极少。在许多大学社区中，没有电影院或娱乐场所。主要的娱乐形式是晚餐聚会、玩扑克、桥牌和麻将游戏。但邀请朋友到家里聚会开销不菲，而且有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教师很少有机会外出参加聚会。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行。有些家庭已经在同一个地方住了四五年，却还没有机会去一趟最近的城镇。

一个习惯了乡村简朴生活的农民或许不会觉得缺少了什么，然而逃难的教授及其家人却对城市生活有着诸多美好的回忆，那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吸引力和令人兴奋的体验。表面上看，娱乐匮乏似乎并没有对高等教育造成多大障碍，但许多家庭和大学内部的人事问题，或许可以追溯到在中国穷乡僻壤的流亡生活的艰辛和乏味。

流亡教授们最主要的忧虑无疑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在战争前，一位月薪三百元的教授总能设法存下一点钱，他可以按时支付保险费，也能为子女的教育做些储备。但现

在，尽管他的月收入可能达到三千元，如果能够偿还欠债就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各大学通过尝试发放多种补助来帮助教职员工应对经济负担。一位教授的基薪可能是每月四百元。除此之外，他可能还会获得三到四项补助，有战时一般补助，可能相当于工资的150%至200%。另一项是米贴，每人每月发放一两百元。还有一项补助是针对日常用品的战时特别价格而发放的。这些补助并不固定，而是会根据物价上涨而适时调整。总的来说，一位教授每月可能获得三千至四千元收入，具体数额取决于他家庭的规模。这听起来像是很大一笔钱，但实际上仅仅够维持基本生活。

有不少教师难以维持生计，已经放弃了教职转而经商，这在战时的中国是相当有利可图的。而那些不愿彻底放弃教师职业的人，则在承担正常的教学任务之余，尽力寻找其他兼职工作。但兼职机会并非总能找到，于是他们便转而寻求其他赚钱门路。我认识的一位教授做旧货生意，另一位协助妻子经营一家餐馆，还有一位销售打字机色带和剃须刀片。更具冒险精神的人则在棉花纱线、染料及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上进行投机。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每个人都变得精打细算，任何可以转化为金钱的物品都成了收入来源。稀有的旧中文书籍、闲置的衣物、钢笔、象牙筷子及金银装饰品，都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买家。

难怪今天在中国没有一个教授能买一件新衣服，要穿戴合适的衣物和鞋子，是预算中的大项开支。在这里不妨列举一些男士在战时可能产生的费用：理发一次，15元或以上；一双袜子，130元；一双皮鞋，500元；一张纸，2元至5元；一支毛笔，22元；当地香烟，一包十支，售价在8元至20元之间。

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没有人能准确预估两三个月后自己将需要多少钱。对于流亡教授而言，经济上的保障几乎是不存在的。

被剥夺了智识上的滋养，被家务琐事所拖累，还时刻为经济问题所困扰，战时中国的教授这样的境况很容易引起公众的同情。所幸的是，他偶尔也有片刻忘我的消遣、一两种愉悦的慰藉。他依然可以点燃烟斗享受自己亲手炮制的烟草，还能用当地材料调制一种廉价饮品，并为炸弹没有落在自己身边而心怀感激。最重要的是，战争并没有剥夺精神上的愉悦，劳累了一天之后，他总能通过重新接触文学巨著或古代哲人的智慧来荡涤心灵，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莫里哀或李白。依然可以提供一个急需的暂时的避风港，让他逃避生活的恐怖和失望。

教授是战争的流亡者，在战争时期如何才能找到从事大学教学工作的意义呢？一些教授已经离开了教育界，那些坚守教职的人，也并不总能从纯粹的学术成就中找到满足感。如果他们偶尔能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那往往是通过他们与那些受其指导或照拂的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之间那种建立了个人化的、鲜活的接触。当一个男孩因失恋而向你寻求开导时；当一个女孩就未来职业规划征求你的建议时；当一些课外活动需要占用你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解决他们特有的社会问题或宗教困惑时，这时你会感到自己正在为充满希望、聪明且未受社会污染的年青一代服务，他们或许有能力在混乱中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种混乱正是我们和我们的父辈所造成的。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家孟子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乐，尽管身处战乱与贫困之中，这份乐事仍萦绕在流亡教授心头。

他的妻子继续

随着战争年复一年地延续，我们所在的山区似乎变得越来越偏远，我们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在这里，并且过得还不错。

我们的偏远位置其实是一件充满矛盾的事情。每天，头顶的天空都充斥着飞越“驼峰航线”运送物资的飞机的轰鸣声，偶尔我们甚至能听到一阵急促的枪声，但我们的个人活动范围仅限于步行可及的距离。偶尔会有来自无名地点机场的军人到访，这让我们无比兴奋，于是大家都会聚拢过来，打探最新的消息，借阅他们的杂志，并且厚着脸皮尽可能多地“顺走”他们的香烟。我们对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对我们亦然。这样的造访让我们意识到，这种奇特的生活正如何影响着我们。

渐渐地，我们的生活都被简化为生存所

必需的基本条件维持着。几乎没有人再有诸如咖啡或发酵粉之类的舶来品了，而且我们都习惯了在厨房里干活。所有的衣服都逐渐穿破了，最新的一件也已是两年前的旧物，而且磨损严重。我们的鞋子该进博物馆了，现在大多数人穿着当地的布鞋或草鞋，以省着点穿那些已成碎片状的西式鞋履。那位医生可能是我们当中最常奔波的人，他索性放弃了鞋子，改穿草鞋。我们现在都戴着当地的浅绿色大草帽，有点像墨西哥的宽边帽，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我们才会翻出仅存的最后一顶外国帽子，然后开怀大笑。如今我们都习惯了彼此，只有当外面来的人看到我们时，我们才会从他们的反应中意识到我们变得多么奇怪。所有的发夹都用完了，长发盘顶仍然是时尚。我们早就放弃了穿长筒袜。睡袍都被改成了衬裙，睡衣则改成了内衣。再过一个冬天，我们就该穿草席了。

为什么不效仿村民的穿着呢？原因很简单。做一件衣服所需的最便宜的布料，

每10英寸的成本为90元。我们属于“固定收入”群体，随着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简朴，而当还有精力思考时，思考的内容也越来越高远了！可喜的是，我们的社区生活展现出一种趋势，即打破人为设定的标准，变得更加真诚和友善，这与过去相比是一种进步。“女士衣物交换站”就是一个例子。当我们中的任何一人发现某件衣物因缩水



骆传芳、骆夏露德一家

或个人体型变化而不再合身时，会立即转赠给其他人。现在，每个人身上都穿着原本属于别人的衣服，而虚假的傲骄感也自然消失了。社区里的每个新生婴儿，都给提供了机会，去翻箱倒柜找出一些必需品。而随着新生婴儿逐渐长大，他们会把自己的尿布和袜子“接力传递”给更小一号的宝宝。

我们的简朴生活就谈到这里，现在该谈谈我们的高深思考了！对于我们的科研人员来说，如此与世隔绝的状态确实非常艰难，或许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想念那些学术期刊和报纸。然而，他们尽其所能地利用现有的条件开展研究。化学系对当地的染料和靛蓝进行了研究；物理学家则开发出了实用的水力发电照明设施，为当地的中学带来了光明；经济学家们则致力于研究我们不断波动的物价所引发的经济现象。我所看到最多的，还是传芳完成的工作。尽管教学任务极其繁重，还要与我分担家务，但他仍孜孜不倦地推进着他关于中国学派和中国人心理特征的研究。

在他的指导下，文学院也在进行一些关于当地宗教和习俗的有趣研究。这里仿佛是古老习俗和传统的博物馆，我们渴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位人类学家来对此做些工作。英语系在过去一年中遭遇了严重的人员流失，我们都在竭力承担自己教学任务之外的额外工作，但我们为英语系在中国的声誉感到自豪，并愿意付出努力以保持这一声誉。

我们的招生规模相对较小，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但我们的高标准吸引了优秀的学生，我越来越觉得他们是值得的。其他大学为了应对战争时期新生准备不足的情况，降低了入学要求，以至于现在被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其水平相当于战前的二年级学生；而我们则增设了五年制和六年制课

程，从而使我们的毕业生能够达到战前大四的水平。这一成果在英语学科中尤为显著，我们拥有可以追溯至15年前的标准化考试和成绩记录。所有的学生在毕业时都有多种职业选择，对于我这样属于1931届的毕业生来说，简直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一般。

在这里，我们难免会有些失落，觉得我们这些大学教师是战争中被遗忘的一群人。但我们更是那些坚定我们当初投身教育事业的初衷依然有效的人，决心坚持下去。在稍感宽慰的时刻，我们知道中国的战争不仅仅是对抗日本，它几乎同样是在对抗无知和贫困，我们在教育战线上的斗争将在击退侵略者之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此时此刻，破坏教育无异于背叛我们女儿这一代人。由于缺乏师资，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无法替代的教师离开。我们真希望美国政府能允许一些优秀的女教师来我们这里工作！这里很安全，有教会委员会提供的较为丰厚的薪水，不用为生计发愁。我们需要一两位经济学家；我们需要几乎涵盖所有科学领域的教师：物理、化学、数学和植物学，再来一位社会学家和一位高级钢琴教师就更好了。拜托，山姆大叔，请放宽限制吧！

我们在这里经历的最奇特的体验之一，是当地一些军人非常友善地送上来一大堆杂志时，这些杂志的时间跨度从1942年1月一直到1943年3月。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杂志，但很快，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产生了一种厌恶感。多年来，我们只有广播新闻和经典文学作品作为阅读材料。看到我们在与世隔绝的杂志中所见证的种种思考和写作风格，着实令人震惊。我们觉得，即使考虑到时间的流逝和文章的时效性，这些杂志所反映的美国人在这场战争的观点，显得非常幼稚，而文章的写作水平更是糟糕。

很难说哪一部分更令人失望：是对战争现实所表现出的痛苦惊讶之情，还是孩子气的“等着看我们怎么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的态度。整篇文章中似乎缺乏成熟的思考，也没有多少具有长久价值的文字。（在提到痛苦惊讶的部分，我忽然把打字机从花园挪到了书房，还没等我的眼睛适应室内的灯光，我就不经意间坐在了小猫身上。）

正如发生在有18个月大婴儿的母亲身上的常见情况一样，这封信在这里被打断了，而我将在几天之后继续写下去，无法保证不会再被打断。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心中最珍视、在生活中也最为重要的主题——我们的小女儿。一岁半的她觉得这个世界非常迷人，并且努力让我们也感受到它的魅力。她是个话匣子（或许像她母亲一样），每天都能学到新的词汇，这些词汇一半是英语，一半是中文。我们在家里使用英语，所以她在这门语言上的进步更为迅速，但假以时日，她将能像她爸爸一样成为双语者。

我有时出于卫生的考虑，真希望她不要这么“民主化”，但我认为，与其把她包裹在棉花里，置于玻璃罩下，让她生活在过度保护的环境中，不如经常带她出去，让她交些朋友。每天，我都会带她乘坐她那辆二手的破旧马车，沿着大路去往“大古树”那里，我们村子的道路在那里与古老的马可波罗古道交汇。在那里，在两块巨大的无花果树下的草地上，她会下车，推着马车、挖洞，并用她的小篮子采集花朵。在这里，我们通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村民、部落居民、藏人、士兵，以及来偏远地区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各有各的缘由骑行，骑在马或驴背上、乘坐马车、吉普车或其他的车，但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看看“图茨”（即骆天同），与她聊上几句。

她对这些都非常感兴趣，微笑着，对穿着西式鞋子的人说“早上好”，而对穿凉鞋的人则说“哈喽”。幸运的是，她并不喜欢被人触碰，但也不会对任何人表现出恐惧。在中国，每个人都喜欢孩子，所有背着孩子的母亲提出的问题，与西方母亲所问的别无二致：孩子多大了？是男孩还是女孩？她能独自走路吗？有几颗牙齿？会说话吗？吃什么？我知道她们在问什么，并且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尽管我无法理解她们在问及如何喂养孩子时，每当我承认不再给宝宝喂奶而是改用牛奶或奶粉时，她们总会露出惊讶的神色！

因为必须通过航空邮件发送，所以我必须在重量允许的范围内停下来。

爱你们所有人。

骆夏露德于华中大学（中国云南）

付强，华中师范大学校史研究中心主任

我与爱国侨领司徒眉生的交往

◇ 孙君恒

知名爱国侨领、全国侨联顾问、澳门归侨总会荣誉会长、朝晖集团董事长司徒眉生（1926—2010），我有幸面晤和交往，得到关爱和鼓励，他那外交家的风采历历在目，值得分享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苏加诺总统的外事助理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键入“司徒眉生”四个字，仍然能够搜索到许多珍贵照片，毛主席、周总理等一代伟人同他的会见，记录了一位爱国侨领的高光时刻。

1961—1965年，司徒眉生随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三度访华，密切接触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毅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

1955年在印尼万隆亚非会议上，周总理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广泛影响。在具体事务上，得到司徒眉生的大力协助。时任万隆会议秘书长、后任印尼外交部长的鲁斯兰评价说，司徒眉生是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人”。

2010年10月13日，司徒先生在澳门病逝。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新闻社等媒体发布官方讣告：“知名爱国侨领、全国侨联顾问、澳门归侨总会荣誉会长司徒眉生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20世纪50至60年代，司徒眉生曾任印度尼西亚开国总统苏加诺

的私人外事助理、华语首席翻译，亲身参与印尼和中国高层几乎所有会晤、会谈，见证了中国与印尼建交、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国和印尼两国友好关系发挥了特殊作用。司徒眉生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来到澳门，团结侨界和澳门各



毛泽东（左一）、周恩来（中）、司徒眉生（右一）

界人士，参与社会建设、热心公益，为祖国建设和特区发展贡献良多。”

回忆“参与创造历史”

2002年春天，我到香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结识在香港的印尼华侨谭贵荣先生，我们一见如故。谭贵荣是司徒先生的朋友，通过他绘声绘色的生动介绍，我才知道当年中国和印尼友好关系的重要桥梁人物是司徒先生，对那一段意义深远的故事甚为好奇，对司徒先生参与创造历史的贡献更是敬佩。谭贵荣给了我司徒先生的名片，我写了几封信问候，期待见面得到赐教。

2006年9月，我应邀到澳门理工学院参加第三届儒学国际研讨会。会议前一个月，我给司徒先生写信，表达盼望拜见老前辈的心愿。司徒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回信表示欢迎。

在澳门研讨会的休息时间，我按照约定前往澳门朝晖集团总部。大名鼎鼎的司徒董事长慈眉善目，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礼貌地询问“你喜欢喝茶还是咖啡？”我看到茶几上的咖啡是内地难得一见的品牌，想体验一下董事长的高级咖啡，一位工作人员马上端送过来。司徒先生坐得与我很近，



2006年，司徒眉生向作者讲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情景

几乎是促膝相谈，关切询问我所从事的职业、武汉科技大学的规模、武汉市经济发展的情况等。

我很好奇地请教司徒先生当年从事外交活动的具体细节，他将作家袁厚春的《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华人——司徒眉生传奇》一书，签名赠送给我：“我的主要经历，都在这本书里了，请您翻翻。”同时，还赠送了中国侨联编印的三本彩色印刷图书，有中文版、英文版、中英文对照版，图文并茂，对中国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详尽介绍，具有大词典式的参考和收藏价值。每本书都超过1000页，沉甸甸的叫人爱不释手。

办公室墙壁上，挂有司徒先生同毛主席、周总理的合影，同印尼女总统梅加瓦蒂的合影等珍贵照片，足以说明他的高层交往非同凡响。我不由产生浓厚兴趣：“先生，您的经历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您怎么由一个青年记者接触到印尼总统？您和毛主席见面几次？”

司徒先生说：“人生有很多偶然，偶然的组合导致了必然。我努力学习，在中学就做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临时记者，在火车上偶遇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总统看我彬彬有礼，翻译到位，就给予我特别通行证，让我随时自由出入总统府，随后成为总统的私人外事助理、华语首席翻译。当时总统很器重我，我常在总统身边，在外交上活动频繁，很受各界信任，于是让我打前站到中国北京联络，几乎成为中国与印尼外交上实际的特使。我到北京机场，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接见，多次见面，给我很高的外交礼遇，有点像后来秘密访华的美国基辛格的待遇，至今难忘。苏加诺总统的女儿、后来的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几乎天天在总统府见面，非常熟悉，甚至叫我叔叔。”

司徒先生说他的经历说来话长，袁厚春写的传记里有较详尽的资料，让我回家后看看。惊心动魄的国际关系史，当事人近在咫尺，顿觉他风采依旧，往事也并不如烟。

我感到机会难得，在办公室拍摄不少照片作为历史资料，并征得司徒先生同意授权使用。我带来了小礼物，包括湖北、河南特产表达敬意之情，当我介绍仰韶大曲周恩来总理喜欢饮用时，他似乎陷入回忆。

交谈两个小时意犹未尽，但不能占用司徒先生太多时间。告辞时，没想到他说：“今天到此，后天我请你与一起来参与国际会议且熟悉的内地代表来参加晚宴，我当东道主请客。”

热忱宴请内地学者

司徒先生细心周到，为了我们方便，将晚宴安排在学术会议代表居住的宾馆旁，那是一家正宗的葡式饭店。我们几个内地学者应约赴宴，他微笑着说：“热烈欢迎学者们光临澳门！你们积极发扬光大中华优秀儒家文化，正当其时。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香港孔教学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等到会，真是名流荟萃啊！澳门大学的校训是‘仁、义、礼、知、信’，就是儒家的‘五常’。祖国文化，源远流长，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

点菜时，司徒先生发扬民主，让每个人在菜单上选自己喜欢的菜，配了葡萄酒和果汁饮料，就餐时各取所需。参加宴会的学者，第一次有机会与司徒先生面对面，都抓住难得一见的机遇刨根问底，获悉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山东大学林忠军教授、南京大学李成贵教授询问司徒先生的华侨家庭经历，广



2006年，司徒眉生（居中）与内地学者合影

东韶关学院学报主编李明山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杨昶教授对中国和印尼建交内幕特别好奇，浙江工商大学徐日辉教授着重了解周总理在万隆会议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出台细节。我在司徒先生和各位学者之间端茶送水，充当临时服务员，乐此不疲。

司徒先生还为我们安排送行，外交家重视细节名不虚传。他让司机开小轿车把我和李明山教授送过拱北海关，还送了澳门两大袋特产。可能是他的专车牌照，我们享受特殊礼遇，车子过拱北海关畅通无阻。

2002年以来，我一直与司徒先生保持联系，每年春节都寄明信片、贺年片表达我的敬佩和感激之情。没有想到2010年，身体健康的司徒先生突然离开。我得知噩耗后心情沉痛，第一时间发电报给先生亲属和朝晖集团表达哀悼。司徒先生外交生涯的传奇、为人处世的智慧、关爱他人的情怀、礼贤下土的谦和，我将永远记在心中。

孙君恒，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武汉杂技团出访南亚五国（上）

◇ 何忠杰

1972年初，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随之也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国际文化交流。

1972年7月，周总理在对外友协关于杂技团出访的报告上批示：即呈主席……拟同意今年派出两个杂技团分访美洲和中东、非洲。杂技团可调辽宁（大连）、上海、武汉、广州、北京和西安等城市的六个团在8月到京集中演出和挑选。选定两个团后集中学习，准备9月下旬至11月出国演出。

周总理亲定杂技团出国任务

1972年8月，对外友协根据周总理指示，组织了一次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战士）、沈阳和西安等六省市的杂技调演，时称“六团杂技调演”。

这次调演之后，1972年至1974年，沈阳杂技团出访美国等美洲五国和朝鲜；北京（中国）杂技团出访伊朗、埃及等西亚北非七国；上海杂技团出访英、法、意等欧洲九国和日本；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出访澳、新两国及香港地区；武汉杂技团出访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南亚五国，出访越南，出访圭亚那、阿根廷等拉美三国，出访塞拉利昂、刚果等中、西非六国。国际舆论将此与“乒

乓外交”相提并论，称之为“杂技外交”，媒体纷纷报道。

这一时期，中国五大杂技团集中10次出访40国及香港地区，武汉杂技团承担了4次出访15国的任务，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履行加强文化交流、增进人民友谊的“杂技外交”使命中，大家亲身经历和感受到各国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忱盛况。

武汉杂技团接受出访南亚的任务后，根据对外友协领导的意见，对出访节目认真进行调整和改进，经过一个季度的严格排练，以一台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杂技晚会，再次展现在首都舞台上。节目包括《狮子舞》《转碟》《五人武技》《钻圈》《杂耍》《抖空竹》《皮条》《双蹬技杂拌子》《耍花坛》《跳板》《顶碗》《切砖》《高车踢碗》《椅子造型》《晃板》《大武术》《车技》等，整场演出清新流畅，朝气蓬勃，受到北京广大观众和对外友协的极大好评。

1973年1月15日，周总理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节目，陪同审查的有李先念副总理等中央领导。总理边看边对节目技巧、服装、道具等，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晚会以欢乐喜庆的《狮子舞》开场，在两名男女演员的引导互动中，“文狮”抓耳挠腮、三扑球、咬尾，“武狮”踩大球、跳梅花桩、过跷跷板，展现出嬉戏活泼、矫健

敏捷的舞狮技巧，是武汉杂技开场节目的一大亮点，博得总理等中央领导的笑声和掌声。

接着是一群女演员表演《转碟》，这个在武汉杂技团建团之初就创演的民族传统节目，经过老一代演员的提炼传承，一直使用真瓷碟，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节目。群演双手可持6只瓷碟，主演可转动8-10只瓷碟，展示平身、蹯马、探海、下腰咬花等技巧。当《转碟》主演尤凤仙表演“顶杯平身”动作时，总理一边热情鼓掌，一边笑着赞赏“了不起！”节目演完，总理说，要花盘的盘子要交待一下是真的。第二天，总理又派人传达他对《转碟》的意见：在节目表演开始时，要向观众介绍一下碟子是怎样放上去转起来的。根据总理的意见，增加了先由两名助演演示怎样将碟子转动起来的过程，然后由主演舞动碟子出场进行技巧表演，收场时所有演员手上的碟子都“平腕”下在舞台上，向观众展示真瓷碟和真功夫。

《钻圈》是跟头翻腾的武功节目，演员展现了前空翻、后空翻、蹯子小翻、两人对钻、三人对钻等过圈技巧准确无误，不料在最后一个动作四人对过圈时，圈倒了。总理说：弄倒了不要紧，再来一次补上。动作重来成功后，掌声更加热烈。这个节目在此后的演出中如有失误，都会按照总理的要求重来一次补上。

《杂耍》是一个手耍类传统节目，演员表演了球、叉、帽等令人目不暇接的抛耍技巧，节目中有一个术称“肖肖”的小技巧（又称回旋镖），由我表演。我将4个十字型“肖肖”连续向外投掷，在观众头上飞行一圈，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再返回到手上。总理说：这个道具的颜色要用红色的。根据总理的指示，“肖肖”的颜色改为玫瑰红，果然鲜艳醒目。

当《高车踢碗》表演行进中踢碗，总理说“了不起”；当小勺踢进杯里后，总理又称赞“这是绝技”。

《顶碗》是武汉杂技团最具代表性的优秀节目。1957年，夏菊花的表演荣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1972年8月，夏菊花在六省市调演的最后一场表演《顶碗》后告别舞台。这次审查演出，当总理看到年轻演员李泽芝表演《顶碗》时，转身问坐在身后的夏菊花：菊花同志，你不演了？夏菊花回答：不演了，周总理听后嘱咐说：也好，我们的事业需要年轻的接班人，往后你就好好培养学生也好哇。夏菊花表示：我会遵照总理的话去做，绝不辜负您的期望。总理还询问碗是不是真的，夏菊花说是真碗，总理说真的好。

《椅子造型》是由多名男女演员表演的集体叠椅倒立节目，也是武汉杂技团首创并不断发展的优秀传统节目，依次呈现了三人含水、双人擦顶、四人双翅卡脖顶，最后以高难度的斜排椅掀起高潮，显示出高超的集体倒立平衡能力。在看到《椅子造型》六人排椅时，总理高兴地说：这个不错，是高等力学的表演。

审查演出结束后，总理亲切接见全团演员，对整台晚会演出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出访作了重要指示。总理说：“这次是‘文革’以来我国派艺术团体首次出国演出。现在，许多国家对我国发生的事情不理解，认为我们毁掉了所有民族传统艺术，我们要用事实回答他们，我们是重视和保护民族艺术的。”“这次我们派你们武汉杂技团去南亚五国访问演出，你们一定要展现中国杂技的多样性和艺术性，一定要表现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为国争光。”总理还嘱咐随团医生沈梅英：“这次在南亚一带演出时间较长，

要多带些预防肠道病的药，以防水土不服。”总理叮嘱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饮食和营养，不要喝生水，要保证演员健康，千万不要让演员生病。”总理还对舞美人员说“你们是无名英雄”，又对乐队人员说“到热带去乐队要穿淡颜色的服装”。

敬爱的总理当时已是重病在身，为党和国家日理万机，还对武汉杂技团这次出访和演员身体关心地如此细致入微，成为激励全团完成好出访任务的巨大动力，令我们终生难以忘怀。

据当年对外友协负责人讲，这是“文革”以来一次高规格的出访，出访的行程路线都由总理亲自审定，并请李先念副总理具体审批专机安排。由此，这次出访都由中国民航派专机接送。全团68人，分乘两架伊尔-18专机，以防止万一有一架发生意外，还能保留另外一半演职人员。为确保任务顺利完成，出访团除对外友协一名副会长参与带队外，外交部、文化部、公安部、新华社、中央新闻制片厂等单位均派人员加入，负责对外联络、安全保卫、宣传报道等事务。

1973年1月至4月，武汉杂技团以武汉市文化局局长申剑为团长，对外友协副会长里若和夏菊花为副团长，应邀对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尼泊尔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历时3个月，演出60场，观众达23万人次。

这是我国继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周恩来总理直接倡导的“杂技外交”，受到各国政府最高规格的礼遇和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

斯里兰卡的《友谊之歌》

访演的第一站是印度洋上的明珠——

斯里兰卡。二月的斯里兰卡，百花盛开，到处郁郁葱葱，各种热带植物、奇花异草千姿百态，美不胜收。而斯里兰卡人民的热情好客，更给我们留下了美好印象。一下飞机，斯里兰卡姑娘就给演员戴上鲜花串成的花环，芬芳扑鼻。斯里兰卡文化部、外交部、斯中友协和华侨组织为我们举行了热情的欢迎仪式。从机场开往旅馆的路上，两旁的群众不断招手鼓掌表示欢迎。

首演式在科伦坡苏加塔萨体育馆举行。这一天，用鲜嫩的椰子树叶编织成的传统装饰，把体育馆门前布置得如同节日一般。体育馆里并排悬挂着两国国旗。斯里兰卡文化部长在开幕式上说：“无疑，中国武汉杂技团通过演出所表达的中国人民对斯里兰卡人民的深厚情谊，将长时间留在斯里兰卡人民的记忆之中。”

在斯中两国文艺工作者的联欢活动中，斯里兰卡青年学生还用中文演唱了一首《友谊之歌》，歌中唱道：欢迎！欢迎！欢迎中国的杂技团，跨越万水千山，来到斯里兰卡，你们传播的友谊，我们永远记心中……。这首充满友好情谊的歌曲，是斯里兰卡国家音乐学院的南达西里，专为欢迎武汉杂技团来访而创作的。他为写好这首歌曲，翻阅了很多有关中国的音乐资料。这首动听的歌曲，伴随我们在斯里兰卡度过美好的18天。

访演期间，杂技团还特别为参加修建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的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举行了专场慰问演出。

班达拉奈克是一位对中国充满友好情感的斯里兰卡已故总理。1959年9月，武汉杂技团第一次访问时（当时称锡兰），班达拉奈克总理和夫人西丽马沃·班达拉奈克及孩子们，兴致勃勃观看演出。在上台祝贺演出成功时，班达拉奈克总理和西丽马沃夫

人，分别给男女演员一一戴上鲜花花环，他们的孩子则向小演员献上鲜花。班达拉奈克总理还发表许多热情洋溢的讲话，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就在武汉杂技团从科伦坡转到其它城市巡回演出时，传来了班达拉奈克总理不幸遇刺身亡的消息。孙川四团长和夏菊花等演员代表武汉杂技团，参加了班达拉奈克总理的葬礼并献花圈。



1973年1月，斯里兰卡总统威廉·高伯拉瓦和夫人、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接见武汉杂技团

为了表达对已故总理的纪念，我国政府于1972年援建了这座现代化的国际会议大厦。14年后，武汉杂技团再次访问斯里兰卡。在前往中部都城康堤的途中，团领导和演员特地下车，向班达拉奈克总理的陵墓献上鲜花。

班达拉奈克夫人成功当选以后，继续执行丈夫的斯中友好政策。这次访演期间，西丽马沃·班达拉奈克总理又亲自出席首演并接见全团演员。班达拉奈克夫人还对申剑团长和夏菊花副团长说：“武汉杂技团是斯里兰卡人民熟悉和喜欢的中国艺术团，感谢你们为斯、中两国人民友好作出的贡献。欢迎你们经常到斯里兰卡来访问。”

两位班达拉奈克总理对武汉杂技团的关爱和赞赏，表达了斯里兰卡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

在斯里兰卡的演出很受欢迎，不料在康堤发生了一场“住宿风波”。我们下榻的皇后饭店是一家高级饭店，经理是波兰人。这天下午到达饭店后，为了抢时间，大家将行李放进房间，就忙着去体育馆装台、排练，直到晚上演出结束。回到饭店后，发现有6个房间住进了欧洲客人，而且演员的行李箱被放在了门外，其中包括副团长夏菊花的行

李箱。饭店副经理解释说：“由于你们杂技团的来访，吸引了不少游客，房子不够住了，只好请杂技团演员加床挤一挤，这6个房间给旅游客人住。”并说：“你们演出去了，没有来得及和你们商量，实在抱歉。”

劳累了一天的演员，听不懂也听不进解释发起了牢骚，有的年青演员甚至大声对饭店人员讲：“我们为了友谊而来，累了一天，这么晚了，还不能休息，明天怎么工作……”。有人还告诉斯方陪同人员，饭店还把副团长夏菊花的行李箱也扔到了门外，她可是中国人大代表，你们知道吗？这件事很快传到了科伦坡，惊动斯里兰卡文化部和外交部，甚至连班达拉奈克夫人也知道了。她指示饭店向中国客人赔礼道歉，并要很好安排中国客人的食宿。

班达拉奈克夫人一发话，这边的省长亲自过问并道歉。饭店方面更是高度重视，住在科伦坡的总经理打来电话表示歉意，并安排演员住进了专门接待国家领导人的豪华大套间。我们深深感到，这次“住宿风波”，也反映出斯里兰卡对中国的真挚友情。

何忠杰，武汉杂技团原副团长

何以同济

◇ 马先松

今年5月，同济医院从上海迁来武汉70周年。

何以“同济”？是每个同济人应该回答的，也是每个关心同济的人欲知晓的。

目前在国家卫健委备案的同济医院有两家，一是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二是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同济医院，应该说都是同济医学的传承者。

同济医院是西医进入中国后第一家没有教会背景的综合性教学医院，是西医在东方大国传播的典型范式，是近现代医院的一面镜子。

纪念同济医院100周年的时候，我作为《同济医院志》作者之一，分别考察了医院的诞生地、迁移地，查阅了上海档案馆、宜宾档案馆的相关史料和老报刊，阅读了能见到的有关记述。本文就“何以同济”为题，探究同济医院几个大家关心的史实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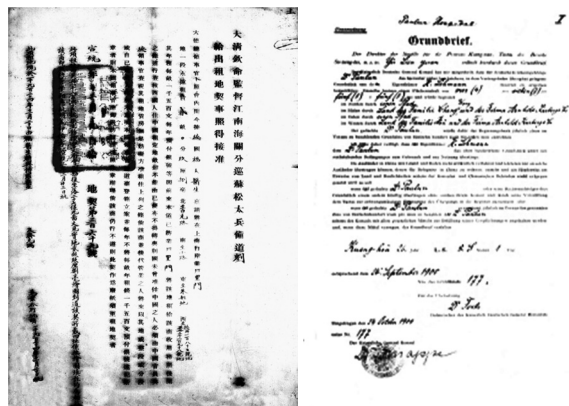
开院时间

同济医院的开院时间，统一认可的是1900年。其实，流行的说法有四种之多——1899年，1900年，1901年，1902年。

同济医院建院时间早于同济大学，但因无准确记载而难以具体确定，只能根据发展脉络去推断。

流行的四种说法，单独去看都有一定依据，只是着眼点与参照物不同。1899年说，是参照德国驻沪总领事关于在中国建一所德国医院的申请和清政府的同意照会。1902年说，则是来自同济购买八国联军撤离时德军留下营房做病房这一事实。而究竟何时以同济医院之名在上海诊治病人，才是开院的关键。

我认为，从1899年到1902年，是同济医院发展不断完备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时间段选择何年作为开院纪念日均有合理性，



1899年，同济医院地契

但选择 1900 年是最恰当的。

1891 年，德国外科军医宝隆，第一次随德舰“伊尔蒂斯号”来上海，既见到这里的繁华，外国经商者已逾万人，其中德人 800 余；又看到这里的落后与不卫生，霍乱、伤寒、疟疾肆虐，便

萌生来此开医院的想法。他回德后退伍，在两所医科大学任外科医师，积累临床经验。

1895 年，宝隆重返上海，先在德国医生策德利物斯的诊所任职，后发现难以实现理想，便在德国教堂附近开一诊所，为建立医院作准备。为获得更多支持，他返回德国募集资金，争取技术力量支持，如会见好友舒尔茨，舒尔茨后来曾任同济医院外科主任。

宝隆在上海建德国医院的想法，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 H·克纳佩的支持，1899 年 8 月 26 日提议在租界人口密集区筹建，很快得到清政府认可。领事馆参赞费舍尔与上海道商定，拨给张家浜新马路（后改名白克路，现名凤阳路）约 7 亩地，上海富商捐钱资助，集得 17000 银元，建房 10 余间——这就是同济医院雏形。

医院更需要技术力量，宝隆早有准备，偕同几位德国医生冯·沙柏、福尔克尔、齐克尔曼成立德医公会，借此在 1900 年的一天开始医疗服务。白天他们在各自诊所上班，晚上来这里做手术，宝隆则全天工作。有人回忆挂出了一块署名“同济医院”的方形牌子，这就是同济医院的诞生，虽无文字记载，当是实际情形。



上海白克路上的宝隆医院大门和病房

后来，我们发现两段文字，可作为 1900 年开院的佐证。一段是 1922 年 5 月 18 日德国驻沪总领事席默尔，在致德国外交部信中提到：“医院建于 1900 年”（德外交部政治档案 R63154）；一段是庆祝同济建院 22 周年大会时，院长比尔特博士在致词中说几乎没有建院时的资料……以后建院时间定在 1900 年，也许可以这么解释：宝隆医生和夏普（冯·沙伯）在白克路的地基上早已开始了门诊治疗工作，但 1902 年接受了德国军队东亚分遣队的木制营房，才有可能接受病人住院治疗。

同济医院开院年份应是确定了，但何月何日并不确定。某报将同济医院院庆日说成 10 月 28 日是不准确的。院庆百年时，是根据当时情况，将活动安排在 12 月 28 日，不等于院庆日就是这一天，如院庆 20 周年时安排在 12 月 17 日。那么，将院庆日确定在教育部同意恢复“同济医院”名称这一天，也许是一种选择。还有一种选择是，将同济医院在武汉开诊的日子作为院庆日。

同济医院建立后，缺乏常驻医生，宝隆意识到必须办一所培养自己医生的学校，一方面传播德国医学知识，一方面解决当务之急，而更长远的是影响中国未来一代。

宝隆的设想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的支持，介绍他会见德国高等教育司司长，利用“德中文化促进会”的影响，由上海领事馆设立一个专门基金会，筹资 25 万马克建立“上海德文医学堂”。宝隆被推选为董事长兼校长，校舍与同济医院相对，后期教学与实习在同济医院，教员亦是医生，但医院与医学堂无隶属关系。

从此，同济医院由普通医院进而为教学性质的医院。1912 年，学堂增设工科，改称“同济德文医工学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医工学堂收归华人办理，1923 年改为“同济大学”，1930 年改为“国立同济大学”。同济医院仍为德人所有，只是同济大学的教学医院。

院名释义

中国有个成语“同舟共济”，“同济”一词最早出自《孙子·九地》“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意思是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同济人都以此来解读院名。但最初，宝隆和福沙柏等人为何用“同济”作为院名，恐怕有着多种考量和解读。

第一种是谐音说，上海话发音“同济”与德语发音“德国”（Deutsch）基本相同，能凸显德国医院的特征，同济医院暨德国医院。

第二种来自几位办医德人同舟共济，以鼓励大家齐心协力，当是狭义的解读，广义的应是指与在上海的德人同舟共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已有近千德人在上海经商和生活，宝隆首先考虑的服务对象应是他们，所以是指医院与在华德人同舟共济。宝隆是战时漂洋过海来上海的，他服役过的德国炮舰“伊尔底斯号”1896 年遇风暴倾覆于黄海，

对中国成语“同舟共济”会有更加深切的感受。

第三种是强调德国人与中国人同舟共济，当是从积极正面角度解读，宝隆到上海的第一眼，究竟是医疗市场，还是中国人民的苦难，还是两者兼有之，不应作猜测性描述。

当然，同济医院不仅为德国人服务，也为中国人服务，救死扶伤做了许多好事。据记载，一度对患病穷人只收诊费不收药费，药品由德国拜耳公司提供。又如腾出整层楼病房，救治“四行仓库”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伤员。在 1947 年上海“5·20”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和 1948 年上海“1·29”爱国学生运动中，积极声援和救治学生，体现了一个医院的道义责任。但真正“与祖国同舟、与人民共济”，是在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之后。

定名“同济”的确也凸显了开创者的智慧。鸦片战争后，1845 年英国伦敦会在上海设仁济医院，1864 年法国江南传教士在上海建公济医院，1865 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设同仁医院。1899 年前，德国在上海没有医院，而德国作为后起的帝国与英美竞争，早有分一杯羹的企图，宝隆办院正符合德国政府的计划。在英、美、法医院名字上各取一字得名“同济”，恰又是中文“同舟共济”之意，不仅涵盖了“同仁”“仁济”“公济”，而且契合了中国“同舟共济”的理念，不啻是一个绝佳名字。

1909 年宝隆去世，同济医院改名宝隆医院以作纪念，因其属德国产权的特殊地位，即便在当年白色恐怖下，也无人盘查，曾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传递情报的“接头处”。方志敏烈士在狱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手稿，就是从这里辗转送到中共中央的。

1925年，瞿秋白肺病加重，中共中央决定强制他入院治病，并明确选定宝隆医院。他听到这个决定，微笑着说：“这样也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可以完成一个心愿了。”他一边治病，一边著书，几万字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三个星期便基本完成，该书对汲取俄国革命经验和指导中国农民革命起了重大作用。

陈赓、程子华等将领也曾秘密在宝隆医院治伤养病，医院技师钱信忠受其影响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为开国少将，两次出任国家卫生部部长。

一脉两支

同济医院真正成为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是在抗战迁往宜宾时期和返回上海之后。

抗战时期，同济大学整体西迁，客观上造成了同济医院历史上的“一脉两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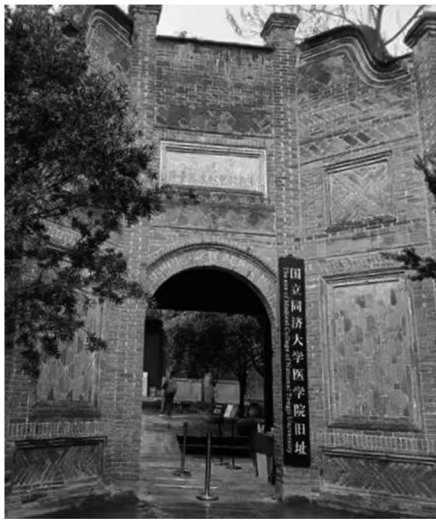
同济大学1927年收归国有，而宝隆医院虽是教学医院而非附属医院，产权属德国，管理者全是德人。同济大学及医学院在奉命西迁时，宝隆医院地处法租界，并未随之行动。而同济大学的德国教师，因同时在医学院和医院兼职，起初随医学院西迁，至江西赣州时脱离队伍，取道香港回上海。中国教职员工则经浙江金华、江西吉安、云南昆明、越南河内等地前行，走到哪儿就将医学院办在那里、医院开在那里，是同济血脉中的重要一支。

抗战，对同济医学院的中国师生是无声的召唤。同济医学院建立起120张床位的中国红十字会临时伤员医院，校长兼任院长。在西迁岁月里，同济医学院毕业生不断加入这支队伍。张静吾、张元瑾、李化民、黄增裕、郭秉宽等组成南京第五重伤医院；李宣果带

领81名师生组成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应届毕业生陈延华、钱章材开办红十字会第十三救护院。队伍到达吉安时，已有中国正副教授8名，开创了中国人自办医院和医学生实习基地的先例。

早在1935年，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就想办一所自己的附属医院。1940年，同济医学院及医院到达四川宜宾李庄，立即恢复教学与医疗，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宜宾办起医院，设两个住院部和两个门诊部，定名“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社会亦称“同大医院”。这是中国人管理同济医院的发端，也是同济医院成为附属医院的开始。

同济医院西迁宜宾6年，为抗战服务，为大西南民众服务，先治病、后结算，开创了战争条件下“定点医疗服务”模式。在这里，宣传卫生科学，揭开和消除了危害川北民众的“痹症”，获当年教育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医院回上海前，将所有医疗设施、检查设备如德制显微镜等，悉数留给了当地。十多年前，我作为同济人来到这里，几位曾接受治疗的老人回忆起当年，感激的话语说的热泪盈眶。



抗战时期同济医院宜宾旧址



上海石门路德国医学院旧址、同济医院迁汉时的上海旧址

医院为抗战培育医学人才，配合同济医学院培养学生 189 名，并开办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医事检验学校。这支医疗队伍，在艰苦岁月继承和发展了同济医学，走出一批中国医学翘楚。他们中有 1949 年毕业的肝胆外科专家、中科院院士吴孟超，1945 年毕业的病理学家、德国自然科学院院士武忠弼和麻风病防治专家、世卫组织技术官员李桓英，1950 年毕业的细胞生物学及遗传学家、中科院院士吴旻和计划生育专家、世卫组织技术官员吴熙瑞。此外，1942 年毕业的熊丸，是蒋介石的侍从医官。

同济的另一支，是指同济医学院和宝隆医院的德籍员工返回上海后，在石门一路 82 号另办德国医学院，仍以宝隆医院为教学医院，历时 5 年，每届 25 人。1945 年德国战败，德国医学院宣布停办，宝隆医院被日军接管改名“中日医院”，医生于石门路 82 号避难。

1946 年，同济大学及医学院复原，德国医生撤离中国，德国医学院的学生全部归属同济医学院。至此，同济的两支再次合一，同济医院回到原址。因日军溃退时将宝隆医院抢劫一空，中美合作所抢先接收宝隆医院，并接收美国驻冲绳海军的 300 张床位设施，故改名“中美医院”。

医院规模扩大，急缺的是人才。两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一个是同济医学院院长唐哲，一个是同济医院院长林竟成。唐是宜宾时期的医学院教授。林本是国民党国防医院副院长，国防医

院迁台时拒绝赴台，1947 年 10 月应聘母校同济医院院长。他俩不拘一格遴选人才，无论德派、英派、日派，皆可为同济所用，一批海外同济人纷纷回国，如裘发祖、过晋源、谢毓晋等。

上海解放，同济回到人民怀抱。唐哲、林竟成分任同济迁汉考察队正副队长，为同济迁汉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1951 年 5 月 20 日，在同济大学 44 周年校庆晚会上，唐哲宣布“中美医院”改回同济医院，全场欢声雷动，殖民主义色彩被彻底洗刷掉。

1900 年同济医院建立，1909 年为宝隆医院，1951 年恢复院名，1955 年迁汉。同济人永远记得迁院武汉时的承诺：“服从国家和人民需要大局，建设中南医事中心。”

这是当年的同济使命，也是继续努力的起点。

马先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